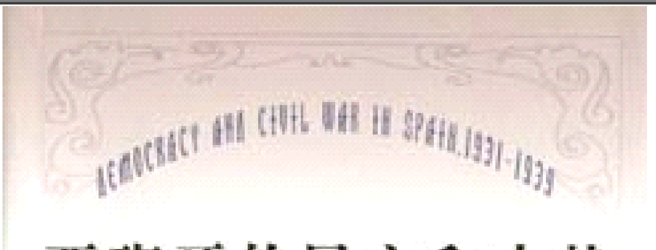


西班牙的民主和内战

(1931—1939)

[英]马丁・布林克霍恩 著



大事年表

1931 年前

1873-1874 第一共和国

1875-1923 阿方索十二世和阿方索十三世的君主立宪政体

1879 西班牙社会党成立

1882 劳工总会（UGT ）成立

1898 美西战争：海外帝国的丧失

1910-1911 全国劳工联盟（CNT ）成立

1917 政治和宪政危机之夏

1918-1923 巴塞罗那和安达卢西亚社会动荡 1921 西班牙在摩洛哥的失败

1923 普里莫• 德里维拉政变

1923-1930 普里莫• 德里维拉独裁

1930 普里莫• 德里维拉倒台

1930 1931 贝伦格尔和阿斯纳尔临时独裁 1 930

8 月 圣塞瓦斯蒂安公约（10 月为社会党所接受）

12 月 共和派军队在哈卡暴动

1931

4 月 12 日 市政选举

4 月 14 日 共和国宣布成立和阿方索十三世出逃

第二共和国 1931 — 1936

1931

4-6 月 关于工资、租赁和教育等的法令

5 月 焚毁教堂

6 月 驱逐红衣主教塞古拉；立宪议会选举 10 月阿尔卡拉• 萨莫拉和毛拉辞职；阿萨尼亚成为总理

12 月 发布共和国宪法；激进派脱离政府；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JONS ）成立

1932

1 月 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者起义

耶稣会解散，并实施其他反教权的措施

8 月 圣胡尔霍的叛乱

9 月 议会同意土地改革法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地位

1933

1 月 无政府主义者起义；卡萨斯别哈斯事件

3 月 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CEDA ）成立和西班牙复兴运动

4 月 地方选举：统治联盟的受挫

9 月 最高法院选举：政府候选人失败；阿萨尼亚辞职

10 月 长枪党成立

11 月 大选：左派失败，激进派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CEDA ）获胜，莱尔罗克斯担任总理

12 月 无政府主义者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里奥哈起义

1934

2 月 长枪党和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合并

3 月 萨拉萨尔• 阿隆索担任内务部长；萨拉戈萨领导总罢工（全国劳工联盟）

保皇派代表团拜会墨索里尼

6 月 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NTT ）的农业工人罢工

10 月 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CEDA ）进入政府，三人担任部长；阿斯图里亚斯和巴塞罗那起义

1935

3 月 另外两个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CEDA ）成员在政府担任部长

5 月 希尔• 罗夫莱斯担任军事部长

9 月 莱尔罗克斯辞职

12 月 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被驱逐出临时政府

1936

1 月 制定人民阵线选举章程

2 月 人民阵线选举胜利；阿萨尼亚组成政府

3-4 月 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青年派合并

5 月 阿萨尼亚就任共和国总统；卡萨雷斯• 基罗加就任总理

5-6 月 长枪党人— 社会党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社会党内部加大分裂

7 月 13 日 卡尔沃• 索特洛被暗杀

7 月 17-18 日 军事暴动

内战

1936

7 月 共和派占领的地区开始搞社会革命，德国和意大利开始援助国家主义派

9 月 拉尔戈• 卡瓦列罗政府成立（11 月全国劳工联盟加入）

伊伦、圣塞瓦斯蒂安和托莱多被国民军占领

10 月 佛朗哥被国家主义者推举为国家元首；苏联的援助开始到达共和国

11 月 佛朗哥进攻马德里失败；共和国政府迁往巴伦西亚；国际纵队到达西班牙

1937

2-3 月 哈拉马和瓜达拉哈拉战斗；马拉加被国民军攻陷

4 月 佛朗哥把长枪党和卡洛斯派统一为 FET ；轰炸格尔尼卡

5 月 巴塞罗那发生“内战中的内战”；拉尔戈• 卡瓦列罗倒台，内格林政府成立

6 月 毕尔巴鄂被国民军攻占

7 月 布鲁内特之战

8 月 阿拉贡内阁解散

8-10 月 北部沿海被国民军攻陷

9 月 贝尔奇特之战

10 月 内格林政府迁往巴塞罗那

12 月 共和国占领特鲁埃尔

1938

2 月 国民军重新占领了特鲁埃尔

4 月 内格林政府重组；普列托辞职

国民军到达地中海；共和国政府控制区域分为两半

7-11 月 埃布罗之战：共和国最后的进攻

12 月 国民军开始进入加泰罗尼亚

1939

1-2 月 国民军占领加泰罗尼亚

3 月 共和国政府发生卡萨多政变

国民军占领马德里和“中心区”

4 月 1 日 佛朗哥宣布内战结束

引言

对英语世界而言，人们今天对 1936 一 1939 年的一～西班牙内战的了解，主要是通过 W . H . 奥登的诗歌，乔治• 奥威尔的经典战争回忆录《 向卡塔洛尼亚致敬》 ，更多的人也许是通过欧内斯特• 海明威的小说《 丧钟为谁而鸣》 。仅此就见证了这次战争在西班牙之外的人们中间所激发的热情，对许多人而言，战争的意义已经超出了西班牙本身。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外国人极其关注在西班牙发生的事件，他们真的到了那里并加入了这场战争，许多人一去不返。对人多数志愿者来说，这场战争代表着一场对抗当时最大的罪恶一 法西斯主义，以佛朗哥将军的国家主义派和他们的意大利和德国同盟为代表一 的圣战：帮助年轻的西班牙共和国对抗其强大的敌人而获得生存，这也许是阻止那种罪恶纲领和政治体制进一步扩张的途径，而它已经威胁着要吞没整个欧洲。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外国人都同情共和国。一小部分人自愿支持叛

乱者，他们同样相信，一场更广泛的斗争要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展开。对他们一 以及对正式接受了该名称的国家主义者一 而言，这也是一场圣战，这是一场为了基督教而反对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圣战，后者以共和国的左翼联盟和苏联的支持者为代表。当时的人无论同情哪一方，都应从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待西班牙内战，这是十分容易理解的。同时，西班牙共和国与其右翼敌对者的对抗，尽管在很多重要方面，都同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围绕民主的死亡所发生的事件有所不同一 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有只年的内战一 但潜在的一致性却是实实在在的。然而认识到以下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从不太重要的方面来看，西班牙的冲突是外在于西班牙的各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其实质上，都可以这样来精确地描绘西班牙内战：尽管有着外国的因素，这场内战源于西班牙的社会环境，从头到尾都是在西班牙人之间进行的战斗。

各种政权会出现和消失；政变也许会成为常事；但是像西班牙内战那样，带有那么多偶然性的重大内战，确实绝无仅有。因此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危机给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些令人着迷的但又困难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诞生于 1931 年的民主没有持续下去？是什么使得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人那么难以和平共处？就算他们不能和平相处，为什么结局会是一场漫长的内战？为什么在战争中胜利女神倒向佛

朗哥和国家主义者？当时的左翼组织把他们的敌人视为“法西斯分子”是正确的吗？这部小册子就是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我们首先必须考察西班牙在 1931 年怎样和为什么变成了民主国家。

第一章 从君主政体到共和政体

在 1898 年的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西班牙同崛起的美国的战争中，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惨遭失败。继失败而来的是更大的羞辱：西班牙丧失了它的庞大海外帝国的最后残存地－ 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西班牙于 16 世纪征服了这些地区，并一直完整地保持到 19 世纪。“1898 年的灾难”造成的物质损失是巨大的，但心理上所受到的打击更大。当西班牙人直面自己国家的软弱、落后和不可避免地沦为二流国家时，便闹哄哄地要求对这一被人们普遍认为“颓废的”国家进行“重建”。对西班牙君主政体而言，1898 年标志着长时期分裂的开始，分裂的终止是 1931 年它被第二共和国所取代。

旧政体

不管衰落与否，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 不仅仅是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包括最有可比性的意大利－ 西班牙确实是落后了。衡量的一个尺度是它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是以乡村和农业为特征。甚至到 193 。年，

46 %的劳动人口仍然直接从事农业，而且至少另外 10 %实际上从事乡村工业。确切地说，“现代”工业主要限于北部外围地区一 加泰罗尼亚的纺织工厂和巴斯克地区的钢铁、造船和造纸工厂。只有在类似阿斯图里亚斯的矿产区，才可以说存在着现代资产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西班牙的其他地方不但是一种乡村经济，而且也是发展迟缓的不毛之地，正是在这上面建立了一个通常令人感到吃惊的不公正社会。在西班牙复杂的农业问题中，有两个问题对我们尤其重要。西班牙南部大片地区，尤其是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拉曼查地区的特征，是这里的大片的私人领地或庄园，通常由不在当地居住的地主所有，并且是由大批穷途末路的无地劳动者经营。在其他许多地区，尤其是马德里北部，最典型的是农民经济：在那里，小农，无论是土地所有者还是佃农，都被许多问题困扰着，在重压下苦苦挣扎，这些问题包括土壤贫瘠、债务沉重、土地小而分散、难以得到贷款或贷款昂贵、很高的租金和不可靠的租借。毫不奇怪，通常为残忍的国民卫队所镇压的乡村暴动，是西班牙生活巾司空见惯的事件。而且“土地问题”是那些寻求使西班牙更加现代化和更加民主的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

未来的改革家们也集中关注两个强有力的机构，它们似乎集中体现和加剧了西班牙的全面落后。一个是西班牙教会，虽然被 19 世纪的开明政府强迫放弃了大多数的地产，但在 20 世纪早期它仍是一个富裕的、

有力的和保持传统的机构，而且与富裕阶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通过对教育的近乎垄断，向那些并不反对它的人灌输了非常保守的宗教、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体系。支撑保守的西班牙的第二个机构是军队：这是一个不服从指挥，而且在军事上无能、对批评过度敏感的荒唐的团体，1900 年后，越来越倾向于干预政治。

支配西班牙紧紧巴巴的经济和不平等社会的，是所谓的“开明君主制”。该政体是继 7 年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之后于 1875 年引进的，它带来了一个基于大地主统治，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的土地贵族和安达卢西亚的“大庄园主”统治之上的政治和平时期。到世纪之交时，有地阶级已经加入了一个由“新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巴斯克地区的银行家和重工业家以及加泰罗尼亚的制造业者为代表的强有力的寡头统治集团中。政治稳定通过表面的代表选举制度而得到保证－ 西班牙于 1887 年实现了男公民普选权制度－ 但这事实上与民主仍相距甚远。通过让选民屈从于一系列的贿赂、经济压力和直接的高压，内务部和地方的首领－有权有势的大亨和政治“老板”－ 为这个或那个“寡头”团体，即自由派或保守派，构建了预先安排的政府多数。对 20 世纪早期渴望“重建”西班牙的大多数人而言，“寡头和党魁”概括了政府的病根。

君主制的危机

1898 年和 1923 年间一个更复杂和难以控制的社会的发展，使得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君主政体左右着一系列新的挑战。一些受过教育的城市中的西班牙人要求进行机构和宪法改革，有些人走得更远，主张用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在拥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反对政体的集权性；在摩洛哥，西班牙和它的军队卷入了它最后的一次殖民战争；左翼的两大群众力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开始有组织地抗议西班牙社会的不公正。随着时间推移，至少城市里的政治开始越来越开放和真正具有代表性，旧的气人为的政党体系开始崩溃，开明君主制本身开始动摇。历史学家们相信，在 1917 年夏天的大危机中，只是由于中产阶级和左翼批评者的分裂，才挽救了国王，使他没有遭到几个月前降临到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身上的命运。直接的危机过去了，但是在接下来的 6 年里，君主制的种种问题反而一直在加剧，加上军队在摩洛哥蒙受耻辱，而且在加泰罗尼亚的城市和安达卢西亚的农村出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据点里，社会动荡风起云涌：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长期的政局动荡。很明显，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君主专制政体无力以其现存方式成功地解决从“寡头”自由主义向真正民主的艰难过渡。

随着米格尔，普里莫• 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政变，开明君主制的生

命实质上已于1923 年终结。由于国王的默许和全面否认君主制的宪法，普里莫• 德里维拉着手建立独裁。尽管这可能会解决君主制直接面临的问题，但从长远看它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早期有一段和谐的时期，其中，它把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即全国劳工联盟（CNT ）赶入地下，镇压了加泰罗尼亚的民族主义，给摩洛哥带来了和平，并享受了短期的经济繁荣，但这之后，普里莫• 德里维拉的信用逐渐丧失。面对着普遍出现的敌对，以及20 世纪20 年代后期遭到大多数有势力的同盟— 富裕阶层，它的军事同伙以及关键的是阿方索十三世本人— 的抛弃，在1930 年1 月独裁者放弃了权力，把决定西班牙未来宪法方向的任务留给了国王。在其后的十二个月里，阿方索首先把首相职位委托给另一位将军贝伦格尔，然后又委托给一位海军上将阿斯纳尔，每个人在管理时都不受议会限制。然而，越来越清楚的是，继续依赖独裁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努力转向代议制政治。

这并非那么容易，因为在表面的独裁背后，西班牙政治已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旧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在1923 年前已经濒临死亡，1930 年并没有以得到认可的和可靠的方式东山再起。然而，并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对君主忠诚、又能代表社会经济方面的实力派的利益从而取代它的新组织。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裁尽管促进了“寡头”政党体系的无情灭亡，但也刺激了社会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发展。西班牙社会党

和它的工会组织，即劳工总会（UGT ）无论从最初与独裁政府的合作中，还是从后来的反对独裁的斗争中，逐步壮大了力量。共和主义的兴起甚至更加富有戏剧性。虽然在经历了 1873 年第一共和国的混乱之后，共和主义的事业陷入消沉，但在 1900 年后共和主义已经开始复苏，尤其是在大城市。阿方索十三世的共谋独裁政治，以及君主制宪法本身的削弱，都站污了君主制本身的原则，而赋予共和主义大力发展的势头，尤其当普里莫• 德里维拉早期的声望丧尽的时候。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共和派的队伍不仅扩张到不断壮大中的有教养的城市中产阶级成员，而且扩展到最近活跃的君主制主义者。对前者的大多数人而言，共和主义意味着彻底改革西班牙社会；而对后者的许多人来说，只不过是相信，如果政治上温和的话，共和制也许比容易引发彻底革命的声名狼藉的君主制能够更好地保护保守派的利益。

在国王和它的大臣们极力摆脱宪法僵局的时候，共和派挑战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明显。1930 年 8 月，各共和派组织的代表在圣塞瓦斯蒂安签署了一个公约，目标是推翻君主制；10 月，西班牙社会党加入了共和派的“革命委员会”；该年 12 月，亲共和派的军官在哈卡（阿拉贡）发动的一次不成熟的和不成功的起义，使这场事业有了最初的“殉难者”。由于害怕进一步的动荡不安，阿方索政府感到有必要实施选举策略，并把地方选举称作转向代议制政治的第一阶段。选举在 1931 年

4 月 12 日举行，选举竞争多少变成了君主制的拥护者同共和派和社会党联盟的直接对抗。在农村，由于社会和政治力量仍然控制在地方首领手中，君主主义者轻松地获得了胜利，但在大多数城市和大的城镇，由于选举更加自由，君主制的反对者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对国王和大多数顾问来说，结果是非常清楚的，而且由于能避开内战的风险，也是很有吸引力的。1931 年 4 月 14 日，随着阿方索十三世离开西班牙，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接掌了政权。

第二章 第二共和国和内战爆发：1931-1936 年

政治和社会力量

临时政府由于是在异常情况下取得权力的，所以在进行总选举之前没有严格的民主制度。第二共和国三次总选举中的第一次，在 1931 年 6 月下旬举行。为了削弱地方首领和争取广泛的政治联盟，引进了多成员选区和新的投票制度。这场竞争产生了一个“立宪议会”，其中亲新政体的派别占压倒性多数。在总共 470 个席位中，社会党人赢得 113 席，激进派 89 席，共和党左派 85 席，新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联盟 55 席，其他各种亲共和派人赢得 60 席。这样的戏剧性的结果部分反映了广泛的但不一定是可靠的意愿，即给共和国一个机会；部分

反映了反共和和非共和的右派暂时的意志消沉和组织上缺乏准备，他们的 50 个左右的代表完全不足以代表其真正的力量和潜力。

在 1931 年 4 月 14 日和 1933 年 9 月间，西班牙由共和派和社会党人构成的政府轮番登场执政。到 1931 年后期，所有拥护新政体的力量都在政府中有了代表，其中包括社会党，各类左翼共和派，以及日益保守的激进党和右翼的天主教共和派。随着 193 王年 10 月天主教大臣们的辞职以及两个月后激进派的下野，权力转向由共和国的强权人物曼努埃尔• 阿萨尼亚领导的左翼共和派和社会党人组成的联盟。

共和主义和西班牙中产阶级

共和国的出现并不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由“进步的”、企业家组成的中产阶级的代表掌握政治权力。在 1931 年前的数十年里，西班牙的金融和工业资本家都与君主制和土地主阶级站在一起；直接的和大规模的资金外流表明，商业利益对新政体如果不是彻底敌对的话，也是持怀疑态度，这是大土地所有者从一开始便持有的。大多数在 1931 年 4 月掌握权力的共和派政治家代表的却是作为专业人员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律师和官僚；文人和新闻记者；学者和学校教师；医生、牙医和兽医— 他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大都已经抛弃了君主制。虽然在像西班牙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这些人员会在文化上发挥重要

作用，但是他们缺乏经济实力，这种弱点会相应地影响到共和国本身。

作为一个主要是中产阶级的事业，西班牙的共和主义，尤其是其较有改革思想的那部分成员，同法国的共和主义一样，苦于在众多的有力量的中下阶层和农民中没有真正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西班牙的人部分城市中，中下阶层尽管有时比表现出来的力量强大，但从事的是相对小规模的经济活动，极少采用大企业的经营方式：家庭制造业，地方商业，简单的服务部门，毫不重要的土地买卖和租借一 这是自 19 世纪中叶教会的地产被取消继承权以来，中产阶级抢先占有的领域。虽然下层中产阶级那部分人有进步的倾向，至少最初是同情共和国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是传统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对工人阶级有着夸大的地位意识，甚至对稍有“社会主义”味道的任何事情都极力反对。那些中下层土地主和支付租金的农民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束缚在一个在经济、文化和思想上屈从于上层和权威教会的网中。1931 年，只有在工业化的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和巴伦西亚、塞维利亚等其他一些大城市的较小范围里，共和主义才真正存在着一个中下层阶级的群众基础。

一方面缺乏群众支持，另一方面，数量上在临时政府中居于优势的共和派政治家们又缺乏内部团结。共和国的临时政府总理和后来的总统阿尔卡拉• 萨莫拉和内务部长毛拉是富裕的信奉天主教的前君主主义

者，他们渴望建立适度改革但政治上温和的共和国来缓解保守派的恐惧。由年长的主张改革的前政治煽动家亚历杭德罗• 莱尔罗克斯领导的激进派，是西班牙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共和派。现在，激进只是徒有虚名，该派对共和国的到来感到心满意足；它马上就开始对前君主主义者提供庇护，并在社会问题上逐步采取了保守的立场。左翼共和派是由一系列党派所代表的：加泰罗尼亚左派和加利西亚自治主义者，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和阿萨尼亚的共和行动派。尽管左翼共和派在具体的政策上不尽一致，但他们都希望把西班牙人的头脑从长达几世纪的一 正如他们所看到的一 传统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结果是过分强调了反对教权。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由于从一开始就缺乏独立而又广泛的群众基础，阿萨尼亚和左翼共和派为了在选举和议会中获得支持，被迫依靠社会党，后者通过劳工总会，在 1930 一 1931 年间为共和国动员了大部分的西班牙工人阶级。到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社会党有其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但是，总体上已经变成谨慎小心的社会改革者，同时，在马德里、巴斯克乡村和阿斯图里亚斯矿区最为强大的劳工总会，传统上是一个温和的技术工人的组织。从 1931 年 4 月 14 日到 1933 年 9 月，社会党获得三个部长职

务：因达莱西奥• 普列托在临时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后来担任公共工程部部长；费尔南多• 德洛斯• 里奥斯担任司法部长；劳动部始终由劳工总会的秘书长弗朗西斯科• 拉尔戈• 卡瓦列罗担任部长，他以前是一个泥水匠，七岁辍学，后来成为战时共和国的总理。

在社会党人内部，对他们的党在怎样的程度上为共和国承担义务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人仅仅指望加强“资产阶级民主”，而其他人则把共和国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前厅。当然，在 1931 年很少有人会赞成革命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该党的现实的任务就是促进立法，以帮助工人阶级，尤其是南部没有土地的劳动者。

1931 年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运动是非常独特的，它必须面对无政府主义的激烈竞争，获得工人和农民的拥护。无政府主义，确切地应该说是工联主义(全国劳工联合会)，建立于 1910-1911 年;他的主要基地是:加泰罗尼亚，在那里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中基本上没有力量;安达卢西亚，在那里，无政府主义从历史悠久的乡村起义和革命创造理想社会论传统中汲取了活力;萨拉戈萨以及阿斯图里亚斯，巴伦西亚和加利西亚的部分地区。虽然在公众的头脑里，全国劳工联盟主要与个人和集体的暴力活动联系在一起，但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从广义上来说，无政府主义反对政治活动—政党，选举和议会—赞成持久的工会斗争，信仰自发的革命，以及革命性总罢工的观念。他们拒绝任何强加的权威和所有

形式的国家，但却接受这样的想象，即革命后的社会是权力完全分散和真正自我约束的。然而，在实践中，全国劳工联盟却具有非常广泛的立场:有倾向于暴力和倾向于和平的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工会改革者;有大量的工人，他们首先是工会会员，其次才是无政府主义者。

全国劳工联盟对成立共和国的反应是令人困惑的。尽管它的官方观点是，所有国家，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制国家，都同样是压制人的和讨厌的，但它的成员最初并没有坚持与一个答应给西班牙生活注入更多自由空气的政体作对。如果全国劳工联盟不是很强硬的话，那么它向更温和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然而，它早期与新政权的冲突一 不顾一切地不在法律和秩序方面“示弱”- 以及社会党人决定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削弱对手的坚定决心，很快就把全国劳工联盟与共和国疏远了。在 1931 年底之前，组织内部的激进分子已经把温和人士抛在一边，带领全国劳工联盟走上了与共和国冲突的道路。全国劳工联盟在 1931 一 1933 年间鼓动的罢工，经常引起工人和两派武装警察力量，即国民卫队和共和国新突击队的冲突。无政府主义者在 1932 年 1 月、1933 年 1 月和 1933 年 12 月的起义，尽管主要是地区性的和很容易被镇压，但是也提供了一个证据，说明共和国并没有接受西班牙的下层阶级这一广泛的群体，而且同时也促使许多西班牙的中产阶级认识到，共和国民主是混乱和革命的温床。

地方主义

西班牙新民主的政治深受其地区的多样性的影响。在政治和法律的各个领域中，地区的不同— 例如在土地拥有制度、经济活动类型、生活水准和教养程度方面— 使得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复杂化了。也许其中最棘手的问题，都是由那些其语言和文化身份都不同于西班牙，或者精确地说，不同于卡斯蒂利亚的地区的野心所造成的。最直接进行挑战的是加泰罗尼亚。这个东北部的地区是讲罗曼语，完全不同于西班牙语，是一种有自我意识的“欧洲”文化，而且，按照西班牙的标准，拥有“现代的”工业化经济。自从 19 世纪中期始，在加泰罗尼亚就出现了活跃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大多数倡导者不是寻求脱离西班牙，而是追求地方自治，保护加泰罗尼亚的独特性以及提高它在西班牙整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加泰罗尼亚的进步观点被广泛接受后，“加泰罗尼亚独立分子”坚持整个西班牙都应当现代化。

到 20 世纪 30 年代，加泰罗尼亚独立派中的主要力量是左派同盟（Esquerra ），这是 1930 一 1951 年形成的民主团体和共和团体的联盟，它的领导人是弗朗西斯科• 马西亚。在该地区的城市中下阶层和葡萄园佃农或农夫中，左派同盟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马西亚的助手和最终的继承人路易• 孔帕尼斯，它还极力维持与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作联系，后者的成员尽管从理论上否认政治，但有时会用选票来支持它。

加泰罗尼亚左翼加入圣塞瓦斯蒂安公约，把西班牙共和派和社会主义派结合了起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真正同情地方自治的观念，以及一直要离间西班牙权力的政策。

巴斯克民族主义带给共和国领导的是不同的问题。加泰罗尼亚地方自治主义至少被人们认可为“进步的”，但巴斯克民族主义被大多数共和派和社会党人视为“反动的”。巴斯克是一个具有独特的非拉丁文化的民族，在大多数西班牙人看来，他们的语言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大多数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保守。除了上述人们对他们的总体看法外，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 ）对西班牙的任何事情都采取一种种族对抗的态度，并憎恶 20 世纪早期影响巴斯克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大多数巴斯克民族主义者都认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非常糟糕的；更糟糕的是，有成千上万的“西班牙”移民工人突然来到他们的上地上，许多人都加入了社会党的劳工总会。在 1931 年看来，共和派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不可能成为联盟。

天主教派和保守主义

1931 年夏天，在议会对宪法草案进行争论期间，阿萨尼亚宣布西班牙已经“不再信奉天主教”。尽管天主教已经失去了对阿萨尼亚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大多数城市和乡村工人阶级的掌握，但是，

在大多数省区，尤其是西班牙的乡村，宗教信仰仍然强烈，教会仍然受欢迎，因此他的这一宣布反映了他对形势严重的甚至危险的错误判断。天主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教会作为一种机构，无论在共和国前还是共和国时期，都是西班牙保守主义的中心，这不只是由于教派、讲坛和出版物的力量，也是由于建立了一张由教会资助的社会，职业和农民的组织大网，大多数信奉天主教的人都被网罗其中。保守的共和派人士如毛拉和阿尔卡拉，萨莫拉，以及一些左翼人士，都认可在教会和共和国之间达成暂时的调和（moud ，沉 vendi ），认为共和国吸收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民中的天主教徒是一件好事。然而，考虑到在整个西班牙左派中反教权主义非常强烈，这类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而且虽然梵蒂冈渴望与新的政权达成和平，但是西班牙教士和天主教俗人中的强有力的人物从一开始就相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共和国采取进攻的姿态是非常必要的。

天主教的不安全感来自可以理解的对财产的恐惧，尤其是在农村，共和国威胁土地所有权，而且，在总体上偏袒工人阶级和农民而不利于雇主和大土地所有者。随着旧政权的党派的瓦解，那些不愿意诚恳地拥抱共和国但又准备实用主义地接受 4 月 14 日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 ）的保守分子，需要一个新的政治组织。这很快就以民族行动党（Acci6n Nacional ）的形式出现，它于 1 931 年 4 月底建立，是一个

“旨在维持秩序的选举组织”。民族行动党中起推动作用的人物是与强有力的世俗组织公教进行会和重要的马德里报纸《辩论报》 联系在一起的虔诚的天主教徒，该报纸在 4 月 14 日已经表示顺从现存的政权。然而，顺从并不表示赞成。民族行动党对共和国持“偶然论”的态度，包括愿意在共和国民主内部工作，但不接受它的持久性；偶然论者坚持认为，不应该根据形式，即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来判断政权，而应该根据他们的内容。由于共和国的“内容”几乎肯定包括反对教权主义和社会激进主义，这样的表述一点也不像他们设想的那么有灵活性。

民族行动党最初是要给这样的人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园：诸如萨拉曼卡律师何塞• 马里亚• 希尔• 罗夫莱斯那样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出版于 30 年后）承认自己在“心底深处一直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以及顽固的保皇党人。然而，几个月以后，后者转而单独追求自己的月标。1932 年 4 月，民族行动党被重新命名为人民行动党（Acci6n Pop - ular ）；一年以后，这一组织依次成为天主教保守党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CEDA ）的核心。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希尔• 罗夫莱斯的领导下，从前面提到的天主教组织中，尤其是从国家天主教与农业联合会（CNCA ）中获取了很多的力量。它的成功一 建立的时候号称有 70 万会员一 反映了保守的共和党人并没有能够把西班牙天主教徒拉向自己的怀抱。

极端的右翼

这么多西班牙的保守派人士，无论富裕与否，都愿意拥护“偶然论”而谴责极端的公开的反共和国右翼，使得后者在 1931 一 1933 年间处于一种虚假的弱势状态。然而，它的三大主流－ 阿方索保皇派、卡洛斯派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 在迫害西班牙民主和建立取代它的独裁方面长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三个当中最古老的是卡洛斯派。它是围绕西班牙波旁王室的王位争端而兴起的一场民众运动。到 20 世纪 30 年代，卡洛斯派已经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反西班牙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它曾经扩展到西班牙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另外它还支持乡村和小城镇抵制集权化，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到 1931 年它的成员萎缩，成为天主教右翼的一个明确的反动组织。带有自由和反教权特征的共和国的突然到来，也许拯救了卡洛斯派，使它没有灭绝；当然该运动现在重新复活，从它在那瓦拉的基地发展到其他地区，采取了用军事反对共和国的姿态，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准军事的组织“义勇军”(Requte）。

阿方索派是流亡国王的顽固支持者，获得民众的支持很少；正如一位卡洛斯派讽刺他们的，他们是“没有军队的总参谋部”。然而，由于他们的个人财富以及与强大的财政、工业和土地占有利益的联系，他们的影响决不像他们的数量所显示的那样弱。通过他们的宣传物和杂志，

通过建立于1933 年早期的西班牙复兴党（Renovaci6n Espanola ）等政治组织，通过培养西班牙法西斯和颠覆政府军队，阿方索派在削弱西班牙民主和为从内战中兴起的佛朗哥政权提供意识形态基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1931 年以后，许多阿方索派分子对法西斯主义产生好感，但是，在1936 年以前，公开的法西斯组织在西班牙并没有获得进展。1931 年后期由拉米罗• 莱德斯马和奥内西莫• 雷东多建立的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JONS ），以及1 933 年秋天由普里莫• 德里维拉的儿子何塞• 安东尼奥创立的长枪党，在1934 年3 月合并之前一 甚至以后，并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部分原因也许是他们的计划是“外来的”；在赞扬暴力、渴望极权主义国家，强调西班牙帝国遗产，利用社会上激进的言辞煽动性地呼吁工人阶级方面，长枪党追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尽管他们有时会否认这一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右翼的其他党派一 卡洛斯派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一 暂时博得了法西斯主义希望争取的那些人的支持。但是，正如1936 年所证明的，大多数西班牙人选择偶然论而不选择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信仰。

问题、政策和成就

第二共和国向拥有土地的金融寡头和工业寡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而他们在1931 年仍然有效地控制着西班牙。这一挑战，因中产阶级共

和派和社会党人的着重点不同而稍稍有所削弱，前者强调制度改革和社会价值观和态度的转变，后者则强调重新分配财富、财产和经济力量。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西班牙改进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多的。1931 年 4 月一 5 月，在保守力量最薄弱的时候，直到举行大选时才意识到缺乏明确授权的临时政府，从试图“通过政令进行革命”中退缩了。这一阶段，自下而上进行社会革命的困难也很大；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同意，应当民主地进行变革。所以，西班牙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获得了时间和机会，安排对试图削弱他们力量的措施进行强有力的反抗。民主改革当然花费巨大，由于从君主制那里继承的直接税的水平特别低，西班牙国家所控制的经济资源非常贫乏，同时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引起了许多短期的问题，这都给民主改革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教会、学校和军队

经过议会旷日持久的和有时非常激烈的讨论，第二共和国的宪法于 1931 年 12 月通过，它反映出，由阿萨尼亚领导的共和派和社会党人的联盟所关心的是要把西班牙统治到 1933 年 9 月。尽管把西班牙定为“所有阶层的工人的共和国”的主张和限制绝对财产权的条款，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主调还是左派共和主义的。在宗教领域尤其如此。在宣布西班牙不再拥有官方宗教后，宪法促使共和国承认信仰自由，使

离婚合法化，终止国家对教士薪水的资助，解散耶稣会并把其财产收归国有，并禁止其他宗教团体参与工业、商业和教育。这些条款单方面废止了西班牙于 1851 年与罗马签订的协定，而且在接下来的 18 个月中成为法律，这标志着从立法上对教会在西班牙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发动了全面的攻击。由于被宪法的反教权主义所激怒，临时政府中的天主教派的部长阿尔卡拉• 萨莫拉和牟拉，在 1931 年 10 月辞职。

甚至在宪法争论开始之前，天主教会和新政权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共和国和梵蒂冈之间的谈判被冷落了；许多西班牙主教，包括托莱多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塞古拉，都丝毫不想掩饰对共和国的仇恨。塞古拉本人最后被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1931 年 5 月，当临时政府似乎不愿意镇压在马德里和一些南部城市发生的焚烧教堂和反教会的暴力时，天主教的情绪被激怒了。这部宪法势必会造成教会一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而这反过来会危害西班牙的民主试验。对那些最终集中到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中的天主教右翼的激进主义者而言，这是一个需要彻底修改的非法文献；更进一步来说，它促使西班牙天主教徒中大多数温顺的人不顾保守的共和派的呼吁，而投入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热情怀抱里。

共和派尤其认为教会的教育职能应当中止，由自由的、义务的和世俗的教育制度来取代。在教育改革方面，共和派和社会党的联盟进展迅

速。在初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大量的国立学校建立起来，教师接受了培训。而在中等教育方面，取代教会的职能有更多的困难，毫无疑问，在认真执行的地方，对教会学校的禁令在短期内会造成教育的短缺。除了教会外，最使共和国感到不安的机构是军队。共和派人士如军事部长阿萨尼亚，在 1931 年担任总理职务之前或之后，都希望军队军事上过硬，而在政治上采取中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最明显的是 8 。o 0 名军官领着全薪退役，阿萨尼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第一个目标。政治中立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中立，在军事上增强的军队更容易威胁而不是支持西班牙民主。无可否认，1931 年 4 月在君主制倒台的时候，军队是冷眼旁观的，但是它对共和国的接受也决不是毫无保留的。军官们对于被那些自学的和自命的军政关系方面的专家们重组感到很不服气；许多人，无论是退休的还是在役的，都开始谋划反对共和国，人们越来越看清共和国不但是反军队的，而且在面对困扰军界人士的两大问题一 地方主义和公共秩序一 上也是“软弱的”。

地方自治

尽管大多数非加泰罗尼亚共和派和社会党人都有着集权的倾向，但是共和派一社会主义联盟还是不能背弃让加泰罗尼亚自治的诺言。在共和国早期，由于许诺早日处理自治问题以及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的直接

让步，左派同盟的领导人马西亚被说服收回自己的宣言，即关于“西班牙联邦共和国内的加泰罗尼亚共和国”的宣言，这样，源自圣塞瓦斯蒂安条约的义务被加强了。由左派同盟领导的这一团体，继续监督自治法令的起草，这一法令通过加泰罗尼亚人在 1931 年 8 月 2 日的公民投票，以压倒性的多数得到签署。由于地方自治的原则在共和国的宪法中已经合法化，最后这一法令在 1932 年 9 月得到议会的赞同。虽然在某些地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西班牙国家的权力还没有明确地界定，而且在 1934 年曾引起严重的后果，但是总体而言，该法令标志着一个复杂敏感的问题得到均衡的和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它的反对者不可能让这一事情在 1932 年 9 月就此结束。因为许多加泰罗尼亚人认为该法令，尤其是在财政领域，远不能让人满足，而政治上的右派和许多军官团体因考虑到西班牙“祖国”被肢解而感到非常愤怒。

巴斯克取得自治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左派同盟的中间偏左的立场使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对马德里政府是“安全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NV ）狂热的天主教信仰和总体的保守主义会使得共和派人士产生这样的恐惧，即一个自治的巴斯克也许会变成右翼进行颠覆的基地：毕尔巴鄂的社会党人普列托称之为“梵蒂冈派的直布罗陀”。当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追求自治，开始与该地的卡洛斯派这一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宿敌进行合作时，这就证实了共和派人士的怀疑。然而，在 1931 一1932 年

的进程中，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转向了实用主义；意识到只有为马德里掌握权力的人所接受，自治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实际上放弃了比较极端的目标，背弃了他们的右翼同盟，向共和派和社会党人靠拢。1933 年，左派对政权的控制开始松弛了，但尽管如此，巴斯克要取得自治，仍要经历漫长的历程。

土地改革

对社会党人来说，共和国最重要的职责是改善西班牙农村贫穷人口的命运，而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1932 一 1933 年达到高潮的劳工总会（UGT ）性质的巨大变化，则使这一真诚的许诺大大加强了。由于其乡村劳动者部分的成员，即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NTT ）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西班牙南部），劳工总会突然从一个主要是熟练城市工人的组织，转变为一个受农村劳动力的穷困成员决定性影响的组织。社会党人的领导对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成员的期望非常敏感，这表明土地问题比其他问题给它产生了更紧迫的压力。

在处理不平等的土地分配的法案提交到议会之前，社会党的部长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改变西班牙乡村的力量平衡。在 1931 年 4 月和 7 月之间，劳动部的拉尔戈• 卡瓦列罗和司法部的费尔南多• 德洛斯• 里奥斯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用来保护佃农的短期状况，提高工资，改善劳

动条件以及乡村劳动者在谈判中的地位。这些法令后来得到了议会的批准，它们在西班牙的大多数乡村都改变了社会的氛围，同时代表了对大地主的控制进行挑战的开始。

1932 年 9 月，一项土地改革法案最终得到通过，这期间经历了几次虚假的启动和曲折的议会程序，其中，右派尽管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为了推迟或冲淡最初的法案，他们成功使用了阻碍法案通过的战术，提出几百条修正意见。一个土地改革机构建立起来了，它着手分解大地产并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力、信息和专门技术，同时还承受着一个漏洞百出和充满矛盾的法案，该机构面临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到 1933 年秋天政治气候发生变化时，毫无进展。尽管改革缓慢，而且许多土地主和乡村雇主都公然挑衅拉尔戈• 卡瓦列罗的亲劳动者措施，但在整个 1932 年，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们还是受到他们的领导人的压制，到 1933 年中期，他们已表现出明显的心灰意冷的迹象，而且越来越具有好战性：全国劳工联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当然也是如此。

阿萨尼亚联盟无法酬报乡村工人阶级的支持者，也不能向规模很大的、在政治上非常关键的小佃农阶层提供什么。虽然一项有利于佃农的乡村出租议案被提交到议会面前，但在 1932 一 1933 年间一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而且 1933 年 9 月，当阿萨尼亚辞职后，该议案就悄无声

息了。左派没有能够用社会立法赢得一个阶层的支持，它也因为其反教权主义而疏远了其大多数成员，将他们白白送给了它的右翼反对派。

民主化的局限性，1931-1933 年

1931 年第二共和国的成立无疑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创造了新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不但在大的人口聚集中心，而且在乡村和小城镇，那些按传统方式行使权力的人，无论在新组成的地方议会，还是在工作场所，都会发现自己面对着更开放和更受欢迎的政治氛围，以及更加自信的下层人。然而，随着君主制倒塌的尘埃散尽，那些渴望变化的人日益明显地看到，西班牙的那些已立定脚跟的统治阶级在保护他们的地位方面是多么坚定和深思熟虑。在政治领域，一些人接受了偶然论，并利用天主教的社会组织以保护自己。其他那些玩世不恭的人，则实行“变色龙”的技巧，宣布自己是共和派希望以此来控制共和国；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则加入激进派，实际上是要把它转变为共和国的保守党，并加剧其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很严重的腐败嗯题。无论哪种方式，很明显的是，在 1933 年之前，地方社会经济力量的拥有者，在保持这种权力以及逃避和公开蔑视不受欢迎的法令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尽管在富有同情心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权力的天平已经毫无疑问地.

向低层阶级倾斜，但是，地主和雇主仍然非常强大，并自信已经准

备就绪，只要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就可以进行反击。同时教会和军官团体也没有受到削弱，而且越来越仇视共和国，所以改革的敌人肯定是强大的联盟。1932 年 10 月圣胡尔霍将军的武装反抗也许是不成熟的和不成功的，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

如果说对西班牙右派而言，共和国作为一个不太令人喜爱的政权，已经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那么，对左派而言，到 1933 年中期，它并没有满足实行深远的不可逆转的社会改革的希望。由于有着许多间题，以及时间有限，这样的希望无疑是不现实的；事实上，除了全国劳工联盟一直持有敌意之外，到 1933 年夏天，阿萨尼亚和左翼共和派发现自己还要应付对议会民主感到心灰意冷的社会党。对议会和官僚程序迟缓感到不耐烦，以及日益意识到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纯粹通过社会立法不能保证其快速和成功地得到贯彻实施，这不仅把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劳工总会内部的其他成员，而且把年轻的社会党人，即社会党组织内部的成员，更重要的是拉尔戈• 卡瓦列罗本人，都推向了左边。左派团结的结束，以及因此其政治主导地位的结束，就在眼前。

两极分化，1933-1936 年

1932 年末，随着圣胡尔霍的叛乱以及土地改革法案和加泰罗尼亚法案的通过，阿萨尼亚联盟达到了顶点。之后它便直线下降。1933 年

1 月的卡萨斯别哈斯事件，包括在无政府主义者起义期间政府军队对安达卢西亚村民的大屠杀，激起了左派的厌恶和右翼的愤世嫉俗的呐喊，并开始了为期 8 个月的政府涣散和分裂的时期。4 月，即在“温和的”右翼集中在一个预感会强大并有良好财力的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后的一个月，地方选举鼓舞了右翼，也同时鼓舞了正在渴望获得权力的激进派。在夏天期间，社会党的左倾倾向进一步加快；虽然大多数社会党人仍然要继续捍卫共和国，但继续与非社会主义者进行合作的信心减少了。

当执政党在高等法院的选举中失败后，阿萨尼亚最终于 1933 年辞职了，临时权力转移到激进派手中，等待总选举。总选举在 1933 年 11 月 17 日举行，妇女首次参加投票。由于社会党人在追求全面多数时，在大多数选区中选择孤军奋战，现在左翼分裂了。而且，同 1931 年不同，当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投票拥护共和派时，全国劳工联合会选择了有计划的弃权政策。结果是阿萨尼亚联盟的两个成员均一败涂地：社会党人的力量缩减到 58 席，整个共和派左翼的席位缩减到 38 席，其中 22 席代表加泰罗尼亚。在中间派和右翼的胜利中，重要的胜利者是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获得 117 个席位）和激进派（获得 104 个席位）；另外 40 个席位由极端的右翼卡洛斯派和阿方索派获得。共和国承受选举和政府发生重大变化的能力面临着考验。

采取守势的民主，1933-1934

1933 年 n 月选举之后，虽然作为最大的议会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也许希望控制政府，但是共和国的总统阿尔卡拉• 萨莫拉以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是非共和派为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正如他的右翼批评者所指责的，总统嫉妒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领导人希尔• 罗夫莱斯，后者成就斐然，反衬出了他自己领导西班牙天主教进入共和国阵营的失败。不过他对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怀疑是真实的，而且考虑到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拒绝抛弃偶然论从而全心全意拥护共和国，这种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权力转移到激进派手中，它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统治了一系列越来越具有右翼倾向的联合政府。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支持自始至终都是重要的;1934 年 10 月，三个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部长最后进入了内阁，而且在 1935 年 5 月到 9 月，其人数上升到 5 个。1933 年 11 月选举到 1935 年末期间，对西班牙左翼来说是“黑暗的两年”。在这期间，1931-1933 年的改革倒退了或遭到了轻视，社会经济权力急速回到地主和雇主手里，左派本身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这决定性地播下了内战的种子。

这些年中由激进派领导但由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操纵的政府的立法记录，在何种程度上应当被视为故意破坏 1931-1933 年在宗教、教育、地区、劳动者和土地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此，历史学家意见不

一致。强调新的立法或从法律上废除旧的东西都会偏离方向。真正应当注意的是政府对实施和遵守立法的态度，尤其是在地方上。在此清楚的是，从激进派的领导人莱尔罗克斯在 1933 年首次获得总理职位起，便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倒退。1934 年间，在西班牙乡村，有利条件又迅速返回给地主、土地贵族和雇主，他们中的许多人抓住任何一个机会，通过解雇、削减工资和驱逐等方法，使前面两年半农民的中等收入发生逆转。

莱尔罗克斯相信 1931-1933 年已经太偏向左了，因此现在希望不可逆转地把主要由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所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引进到共和派群体中。虽然共和国可能会接受这种具有理论意义的战术，但它的可行性已经被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思想和财产支持严重削弱了。希尔• 罗夫莱斯也有他自己的“战术”，其中包括逐渐获取“全部权力”，而且把共和国转变成为更像是一个“联合国家”，这受到基督教原则的启示，同时也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有类似之处。撇开这在左派中所引起的恐惧不谈，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支持的代价是复归到君主制时的社会形势，尤其是在西班牙农村一 这一进程只能具有爆炸性的后果。

左翼的反应

由于在共和国领导之下社会改革受到限制，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全国劳工联盟的老百姓都感到灰心；当激进派和右翼试图否定似乎一无所获的东西时，好战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1933 年 n 月全国劳工联盟成员儿乎一致同意对选举弃权，以抗议共和派在改革方面的缺点，这一行动以及阿萨尼亚政府对全国劳工联盟的压制，都对左翼的失败起了很大的作用。12 月继而爆发了整个共和国时期最为广泛的无政府主义起义。最严重的是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邻近的里奥哈，该运动最后被武力镇压。但是到 1934 年春天，阿拉贡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和反弹力都还是非常明显的，这时候，该地区的首府萨拉戈萨因为总罢工而瘫痪了几个星期。与此同时，西班牙的社会主义正处于被称作“布尔什维克化”的早期阶段：这是向革命立场的转变，其中，普列托等温和派正在努力保留党派的影响和官方职位。社会党人的左倾不仅是因为受到在职位上面屡屡受挫的影响，而且也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主要是以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惧。从意识形态上讲，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也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西斯主义者；然而，考虑到它独裁的趋势，希尔• 罗夫莱斯和其他主要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成员的好战的言辞，其年轻人行动的法西斯姿态以及它所代表的严重的社会倒退，就不难明白它在左翼中所引起的恐惧。1934 年 2 月奥

地利的社会党人，被在意识形态上类似于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天主教政府所粉碎，使得许多已经强烈意识到他们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同志所遭受的命运的社会主义者，确信有必要做最坏的打算。拉尔戈• 卡瓦列罗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贯的敌人，现在开始号召一个“工人阶级同盟”，其中包括社会党人、全国劳工联盟、弱小的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左派。

1934 年之后，气氛越来越紧张。5 月任命强硬的激进分子萨拉萨尔• 阿隆索担任内政部长，标志着政府对社会问题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希望激起孤注一掷的罢工，从而进一步削弱工人和左翼。6 月，在不断加剧的乡村失业和雇主的不妥协的压力之下，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号召了一次农村劳动者罢工，罢工的迅速失败给整个劳工总会造成了沉重打击。如果纯粹通过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外部对政府施加压力这就可以发生，那么社会党人和共和派左派不禁要问，如果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真正进入内阁它会做什么呢？对整个工人阶级左派而言，答案似乎是奥地利的悲剧会在西班牙重新上演：对共和派左派而言，共和国的宪法将被修改，从而不复存在。该年夏天，当围绕加泰罗尼亚自治和巴斯克地方政府问题而产生争议时，加泰罗尼亚自治派和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得出结论，认为右翼也决心重新加强中央权力。

1934 年 9 月下旬，希尔，罗夫莱斯击跨政府，西班牙独立右翼党

团联盟被允许进入一个经过改革的内阁。社会党人的反应是举行总罢工。在西班牙大多数地区，尤其意志消沉的乡村，由于准备不足、缺乏决心和政府坚决的行动，罢工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矿产区，它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其中不仅包括劳工总会的工人，而且还包括全国劳工联盟和共产党人，这是第一次实际地显示“工人联盟”的力量。在巴塞罗那，爆发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起义，左派同盟领导人孔帕尼斯被加泰罗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诱使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巴塞罗那起义由于没有谋求全国劳工联盟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了，但是阿斯图里亚斯的起义坚持了两周左右，最后在付出大量流血之后，被弗朗西斯科• 佛朗哥将军指挥下的西班牙和摩尔人的军队所击败。

从阿斯图里亚斯到人民阵线

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之后，共和国的前景更加暗淡。最直接的后果是 1934 一 1935 年秋天和冬天实施的严酷镇压。大规模的逮捕造成了 30 000 多名政治犯；许多左翼的新闻机构，大量左翼控制的委员会以及加泰罗尼亚独立法案都被暂时中止。全国劳工联盟一 在共和国期间不止一次一 事实上被迫转入地下，大多数劳工总会的领导人被监禁。尽管如此，主要由于莱尔罗克斯和激进派所起的缓作用，镇压停止了，没有出现保皇派右翼和大部分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所要求的极端

情况：很少人被判处死刑，同时至少左派仍然合法，加泰罗尼亚法案仍然存在。从 1935 年春天起，共和派左派和社会党人因此而能存活下来，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联盟— 人民阵线，抵抗未来的“法西斯主义”。在阿斯图里亚斯起义之后几个月里，左翼的恢复证明了右翼的很多人的看法：粉碎左翼和毁灭共和国的大好时机已经错过。聪明的领导人，对某一地区工人阶级战斗力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印象深刻，认识到不适时地发动政变只会激起而不是阻止左翼全国革命的爆发，因而开始相信更加机敏的策略。可能正是由于希尔• 罗夫莱斯相信右翼可以通过选举获得“全部权力”，才使得 1935 年 5 月至 12 月间担任陆军部长的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与陆军总参谋部细心地建立良好关系，进而发动军事接管行动。另一个阻止他的因素是，他认为如果政变获得成功，权力不可能归属于他这样一个文官。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和激进派的合作，已经证明不能给阿斯图里亚斯之后的西班牙提供什么积极的东西。虽然希尔• 罗夫莱斯和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内部真诚的“社会天主教”少数派，渴望表明他们要进行改革的决心，并希望通过把农村佃农转变为财产所有人的计划，来保持他们的农民支持者们的忠诚，但是，面对保皇派和他们自已党内反动的多数派，这一计划进展甚微。至于激进派，在 1935 年，该派因为与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关系紧张以及一系列财政丑闻，而开始分裂，当包括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在内的

第三联合政府在 1935 年 12 月倒台时，阿尔卡拉• 萨莫拉乘机把该派从等待新的选举的临时内阁中排挤出去。

新的选举于 1936 年 2 月 16 日举行，在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上首次由巨大的、具有凝聚力的左派同右翼的联盟进行势均力敌的竞争；激进派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实际上消失了，留下了没有人能有效代表的政治中心。这种对立象征着 5 年前出现的两极分化的迅速发展，其中人民阵线要求重新执行 1931 一 1933 年的政策，右翼则要求彻底的宪法修改。双方都对对方取胜后将出现的后果持悲观态度，这生动地证明了他们不可能共存。对人民阵线而言，右翼的胜利会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对右翼而言，人民阵线的胜利则直接导致“布尔什维克”革命。

1936 年不祥的春天

1936 年 2 月 16 日的选举，人民阵线获得了微弱多数的选票，但由于共和国的选举体制的特点，它拥有了决定性的议会多数。阿萨尼亚作为纯粹的共和派政府的首脑，迅速重新获得权力，社会党人则选择不参加内阁。在释放了几千名的政治犯之后，新政府开始恢复 1931 一 1933 年的教育、宗教和土地政策；另外也恢复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并对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做出了关于自治的许诺，他们对共和国的忠诚因此而得到保证。

然而，西班牙的命运是在议会和内阁之外被决定的。在大部分南部地区，气候异常使得自 1935 年下半年以来长期的乡村失业问题更加严重，现在乡村的穷人们以新的攻击行动来庆祝选举的胜利。由于预见到要发生土地改革，在南部的许多省份里，穷困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占领了大地产；在耶斯特（阿尔瓦塞特）等地，一些村民因此而死于国民卫队的手里。尽管土地占领和城市罢工的迅猛发展是自发的和极不协调的，右翼还是把它们视为他们所预言的随着人民阵线的胜利会出现的革命的证据。选举失败使得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偶然论策略被粉碎，右翼转向倡导反对共和国的暴力和阴谋。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失败的主要受益人是法西斯主义的长枪党。自从成立以来，两年半里它一直是一支没有什么影响的政治力量，现在由于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中幻想破灭的年轻人的加入，长枪党的成员数量迅速膨胀。在马德里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它的穿蓝衫的好斗分子加紧进行反左翼的恐怖活动，试图动摇共和国的根基。

同时，针对共和国的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主要的策划者是莫拉、戈代德和范胡尔将军等一批高级军官，以及对共和派的另一阶段改革抱仇视态度和 1931 年以来在思想上被右翼的宣传策反过去的中层军官。该阴谋名义上的领导人是圣胡尔霍，他在 1932 年叛乱失败后流亡到葡萄牙，但是，是莫拉在 4 月担任了“领导者”的角色。卷入这一

阴谋还有卡洛斯派和极端右翼的政治组织。卡洛斯派从共和国的早期便着手建立准军事性的组织“义勇军”（ Reqete ），而且从 1934 年以来一直在认真地准备叛乱。1936 年 3 月，当莫拉被任命为潘普洛纳— 纳瓦尔的卡洛斯派根据地的首府— 卫戍部队的司令时，他与当地的卡洛斯派的首领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目的是希望吸引“义勇军”加入计划中的叛乱。阿方索派现在由强硬的和充满野心的何塞• 卡尔沃• 索特洛领导，包括希尔• 罗夫莱斯本人在内的主要的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成员，用金钱和重要的社会关系来支持该计划。虽然长枪党不是这次活动的主谋，但是毫无疑问，它会参加要发生的任何右翼叛乱。

面对遍布全国的动荡不安，长枪党人的暴力、谋反的谣言以及右翼新闻机构和出版物的好战表现，共和国要求它的领导人要有力量、团结和有决心。但这些品质大都没有体现出来。尽管何塞• 安东尼奥• 普里莫• 德里维拉和其他一些长枪党头领被囚禁，军事指挥也进行了三心二意的改组，但是无论是长枪党的壮大还是其军事威胁都没有被有效控制。建立强有力政府，以及挫败右翼的颠覆、保卫共和国，有力地推进改革，消除对社会革命的恐惧等希望，都寄托在阿萨尼亚和普列托身上，前者在 5 月任总统，后者是社会党温和派的精明而又善于斗争的领导人。然而，由拉尔戈• 卡瓦列罗和“布尔什维克”主宰的社会党领导层，排除了普列托担任总理的机会。普列托坚持，社会党人的调和能够最好

地防止保守的西班牙人日益明显地倒向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拉尔戈• 卡瓦列罗对这种观点却无动于衷，他炫耀《 真理报》 （pravda ）赋予他的“西班牙的列宁”的称号，喜欢用资本主义即将崩溃，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景来诱惑信奉社会主义的群众。由于社会党左派在党内与温和派的关系恶化，它与迅速发展起来的共产党的联系史加密切。3 月，两个组织的年轻人的运动开始融合，共产主义青年团体实际上吸纳了青年社会党人，这被宣传为左翼兄弟友爱的体现。尽管缺乏认真考虑的革命目的和革命战略，拉尔戈• 卡瓦列罗和社会党的左翼却因此烘托了政治氛围，并使得建立强有力的共和派政府成为不可能。虽然新的总理，那位令人作呕的加利西亚共和党人卡萨雷斯• 基罗加，宁愿无视严重的密谋的存在，虽然密谋者的准备也并不那么容易，但到夏初，在强大的右翼民众的支持下，军事叛乱差不多已经准备就绪。7 月 13 日，当共和派的警察为了报复他们的一个同事被长枪党分子杀害而谋杀了卡尔沃• 索特洛时，叛乱者有了最好的借口实施行动了。

第三章 内战：1936-1939 年

从叛乱到内战：1936 年 7 月-12 月

_ 1936 年“不祥的春天”期间，不管右翼的密谋者一和左翼的斗士们头脑里想什么，但想到的决不是漫长的内战。军事密谋者们精心策

划的计划是要尽可能快地接管权力；然而，如果这一理想是根据 1932 年的路线发出的标准宣言（pronunciamiento ），那么就不仅仅是莫拉将军一个人意识到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必须征服反对派力量了。叛乱军官们的准军事同盟，卡洛斯派和长枪党人，当然渴望让他们的左翼敌人流血，但是他们想到的实际的军事冲突是数天而不是数年。使 1936 年 7 月 17 一 18 日的起义转变为内战的原因，首先在于军官团以及武装警察部队的犹豫和意见不一，致使他们没有能够迅速控制全国；其次，共和国政府决定武装劳工总会和全国劳工联盟的民兵，这使得叛乱在重要的城市中心遭到失败；最后，外国力量的干涉，致使双方继续无限期地斗争下去。

叛乱及反应

按照计划，军事叛乱于 1936 年 7 月 17 日在西班牙的摩洛哥和加那利群岛开始。在摩洛哥，指挥者是佛朗哥，虽然他是后来加入这一密谋的，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英国同情者的资助下，他乘飞机从加那利飞到摩洛哥。7 月 18 一 19 日，西班牙本土的卫戍部队发生叛乱，迅猛地从安达卢西亚向北扩展。在卫戍部队指挥官一致支持和民众明显同情叛乱的那些省份的首府，叛乱很快取得成功：例如，在潘普洛纳，这里成千上万的纳瓦拉的卡洛斯派分子争先成为志愿者；在布尔戈

斯，这里是古朴的古代卡斯蒂利亚的中心；以及保守的西班牙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叛乱者有时大胆放肆、有时仅仅是虚张声势，在一些城市获得了成功，例如在全国劳工联盟的据点萨拉戈萨、塞维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科尔多瓦，以及阿斯图里亚斯的首府奥维耶多，在这些地方，民众的风气显然是不相宜的。然而，在其他重要的城市，包括南部的马拉加，北部海滨的桑坦德，以及毕尔巴鄂的巴斯克城，叛乱不是没有发动，就是被忠诚的军队和两支主要的武装警察部队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所镇压。在一些城镇里，警察的态度确实决定着局势向哪方面倾斜。

由于叛乱远未获得完全成功，因此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结局至关紧要。形势越来越混乱，在马德里的中央政府和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都发现自己需要向劳工总会和全国劳工联盟分发武器来抵抗法西斯主义。在马德里，一天三次更迭政府。首先是卡萨雷斯• 基罗加，他大大低估了他所称的“可笑的阴谋”的严重性，并拒绝武装工人，结果自己惊慌失措而让位给更加保守的马丁内斯• 巴里奥。后者在通过电话尝试与莫拉和其他叛乱指挥官达成妥协停战失败后，也辞去职务而被阿萨尼亚的朋友何塞• 希拉尔所取代。现在做出了武装工会民兵的困难决定，这使得工人在马德里最后发生起义时能够进行镇压。在巴塞罗那，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的长官孔帕尼斯害怕武装全国劳工联盟时，后者的成员从兵工厂获得了武器；同忠诚的警察一起，他们制服了叛乱者，

粉碎了发生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叛乱。武装的工人也在圣塞瓦斯蒂安和西班牙东部的主要城市巴伦西亚帮助打破了平衡。到 7 月 22 日，即军事密谋者们曾经希望控制整个国家的日子，西班牙明显地分裂为两个阵营。叛乱者控制了西班牙北部和西北部一带，向东扩展到阿拉贡，但没有控制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另外，他们在加那利，在马略卡和伊维萨，在西班牙摩洛哥，以及在安达卢西亚的小块地区（包括该地区的四个主要城市，以及加的斯和阿尔赫西拉斯之间的西班牙大陆的最南端），都取得了胜利。此时，共和国拥有了北部沿海的大部分地区，加泰罗尼亚，梅诺卡和西班牙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当前的僵局可以通过下列方式之一来结束：通过和平谈判，或一方或双方的军事形势突然发生变化。莫拉先前已经拒绝和平谈判，接下来的两个逐渐呈现的变化使得它更不可能：共和国政府在许多名义上由它控制的地区已经失去了权威；同时在两大地区由于狂热派向他们的政治敌人复仇已经导致流血。现在唯一可能的是用军事手段来解决目前的形势，而且也很难看出如何使它很快奏效。发动叛乱一个星期内，密谋者原计划的顺利的、快速的和外科手术式的政变（coup detat ）已经转变成一场全面的内战。

军事和经济资源

决定政变结局的决定性因素，是准备、时机、大胆和达气。然而，

内战的胜利取决于军事、经济，以及（从更广的方面来讲）人力资源的分配、调动和配置。西班牙内战之初，对双方资源的考察揭示出这些资源如何微妙地形成平衡，并突出了对这些资源的使用方式可能对冲突的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忠诚的官员和警察在 7 月 17 一 20 日的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显示出，尽管叛乱的性质也许主要是军事叛乱，但远远不是所有军人的叛乱。在该事件中，西班牙本土军官团中支持叛乱者和保持忠诚的人数大致相等：75 写的师级将领，70 %的旅级将领和大多数的团长都保持忠诚，但低级，尤其是年轻的军官，则压倒性地、狂热地与叛乱者站在一边。1936 年 7 月末，叛乱者宣称拥有 62 000 名军官和人员，政府方面则大约有 550000 名。武装警察内部的平衡则是另一番景象：在 68000 名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中，60%的人保持忠诚：这一点让人感到很意外，因为国民卫队以镇压乡村穷人而著名，但这对于早期在许多地方挫败叛乱却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空军方面，政府占有 3 比 2 的优势，同时海员的兵变使大多数海军站到共和国一边。也许这些数字会造成某些误解；那些保持“忠诚”的许多军队和警察官员，这样做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当地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出于信仰，而且共和国的领导受到限制，不能充分利用他们。

考虑到上述的力量平衡，决定性的军事因素应在西班牙大都市之外。驻扎在摩洛哥的由佛朗哥将军指挥的 24000 多人的军队，是西班

牙军队中无可比拟的最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且他们百分之百支持叛乱。如果— 考虑到共和国明显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这种假设是很可能的—把非洲的军队从摩洛哥运送到大陆，那么军事优势会迅速转向叛乱者。

1936 年 8 月，普列托宣称由于共和国在经济资源上的优势，叛乱者注定要失败。他当然有一定道理。政府拥有西班牙银行的大量黄金和白银储备，同时也拥有西班牙主要的工业区，尤其是巴斯克沿海地区，这里钢铁业和军火工业都很发达，而且生产柑橘和橄榄油等重要的出口农产品。如果政府能够守住自己的地盘，克服北部沿海与该地区其他地方的隔离状态，很好地利用其贵金属储备，购买必要的原材料，并养活城市的大量人口，就会继续保持对主要位于乡村的叛乱区域的优势。

外国的早期介入

虽然内战中的双方都曾从对方的国际关系中捞取宣传资本，但是双方都没有理由认定其敌方的对外联系对第二共和国发生的事件或内战的实际爆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左派方面，莫斯科和第三国际即使在战前对西班牙有一些影响，他们的态度也是鼓励人民阵线要求民主而非发动革命。在右派方面，尽管意大利和德国的人员在西班牙活动积极，并同情西班牙右派，但是不能说他们对它施加了压力，在物质上他们也没有实际地资助它颠覆共和国。虽然一个保皇派的代表团确曾在 1934 年

3 月拜访过墨索里尼，恳请他在未来可能的叛乱中进行帮助，但是除了花言巧语之外他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然而到 7 月 19 日，双方都开始寻求外国的帮助。共和国政府当然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以这样的名头可以指望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武器。最明显的供应商是共和国的民主同道英国和法国，尤其是后者，它在 5 月也选举出一个民主阵线政府。7 月 19 日希拉尔向法国社会党总理莱昂• 布鲁姆要求武器和飞机。由于最初布鲁姆表示了同情，结果在 8 月初，少量法国飞机运抵西班牙。然而，就在 7 月底以前，布鲁姆因该问题而面临着内阁的分裂，法国的右派大声反对，英国的鲍德温政府也明确表示不欢迎法国支持共和国。因此布鲁姆被迫放弃他最初做出的帮助西班牙民主政府的承诺，进而提议欧洲的主要力量一致同意对西班牙实行“不干涉”政策。到 8 月末，不干涉正式成为现实。

布鲁姆希望，在叛乱者寻求外国帮助明 r 显获得成功的情况下，如果忠实地遵守不干涉政策，在理论上讲会对共和国有利。在进入敌对状态的第一周，佛朗哥同时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求助。墨索里尼犹豫不决；他对佛朗哥发来的要求用军用和民用飞机进行援助的两封电报没有做出回应，之后，这位意大利的独裁者最后被流亡的阿方索十三世和一个高级保皇派代表团的动听的奉承话打动了。结果，12 架价值 100 万美元的萨伏伊-81(Savoia-81)轰炸机在 7 月 29 日离开意大利前往西班牙

摩洛哥;只有 9 架到达目的地，其他 3 架在途中坠毁。通过两个在摩洛哥活动的纳粹商人,佛朗哥接近了希特勒,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比较积极;在认识到叛乱者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缺乏把非洲的军队运到西班牙本土的工具—后，希特勒授权向摩洛哥派遣 30 架容克(Junker) JU-52 运输机。意大利和德国的飞机使得在两地之间进行空中运输成为可能，在 7 月底和 8 月初，这些飞机载着西班牙在非洲的大部分军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塞维利亚。8 月初叛乱者仗着在该地区有着空中优势，通过海路而完成了军队的运送过程。因此，叛乱获得了一个新的推动力量一 而且，一旦开战，来自意大利和德国的援助就会源源不断。

同时，由于共和国实际上已经被他的民主同道所背弃，所以转而求助于苏联。时间和环境都非常有利。希特勒在 1933 年 1 月登上了德国总理的位置，在此之前一直把国际法西斯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毁灭的前兆的斯大林由此断定，国际法西斯已经不但对欧洲国家内部的左派，而且对苏联本身的生存都构成了威胁。他的对策是在 1934 一 1935 年接受了抵制法西斯的人民阵线政策；这包括共产党人支持受到法西斯威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同时，苏联努力在外交上争取与西欧民主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在回应西班牙人民阵线请求帮助的过程中，斯大林也在追求他所设想的苏联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当然，如果到目前为止还很虚弱的西班牙共产党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有所壮大，那就更好了。苏联

的第一批援助在 1936 年 10 月开始到达西班牙，但显然苏联不打算在西班牙共和国推进社会革命。

进攻马德里

在 1936 年 7 月底和 10 月初之间，叛乱者明白了佛朗哥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协议给他们带来的优势。在内战之初西班牙的军事地图是非常复杂的，两个地带都分裂成两部分：叛乱者的地带因共和国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占领的地带而被分开，共和国的地带则因北部沿海的隔离而被分开。因此形成了多条战线。北部，尽管在阿拉贡地区，全国劳工联盟的民兵从巴塞罗那向前推进，试图重新占领以前无政府主义者的萨拉戈萨要塞，但在其他地方叛军掌握了主动。叛军和卡洛斯派的“义勇军”从潘普洛纳向北推进，到 9 月份，在意大利轰炸机的帮助下，已经占领了伊伦和圣塞瓦斯蒂安，切断了巴斯克其他地区和北部沿海同法国边境的联系。其他的特遣部队则从北部叛军掌握的城市向南进发，进攻马德里。结果却被城市民兵组织困在马德里北部的瓜达拉马山区。

最后的挫折相应地增加了在南部进行进攻的重要性。在军队、长枪党人和卡洛斯派的部队从叛军占领的塞维利亚、加的斯、科尔多瓦和格拉纳达呈扇面散开，开始攻克安达卢西亚的其他地区时，佛朗哥的非洲军队和随同的摩尔人军队从他们南部的滩头阵地迅速向北推进到埃斯

特雷马杜拉，并向马德里进发。左翼民兵和忠诚的国民卫队和突击卫队断断续续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不能彻底地阻止叛军的进攻。随着在 8 月 10 日占领了梅里达，国民军控制的两块地盘合为一体。8 月 14 日左翼控制的要塞巴达霍斯陷落，9 月 2 日，马德里前面最后一个重要的城镇塔拉韦拉被攻占。

国民军的军事进攻所到之处，就大量疯狂地屠杀左派民兵和知名的左翼人士和共和国活动家。仅在巴达霍斯一处就杀死至少 200 。人，他们大多数是在斗牛场里被机枪扫射致死的；在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其他城镇和村庄，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军团士兵、摩尔人或右翼民兵之手。这样的镇压并不限于以前冲突激烈的南部，即使在纳瓦尔和马略卡等没有实际的军事活动，没有什么社会分化的地区，被杀害的政治犯仍然数以千计。恐怖是冷酷的和蓄意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敌对者，保证国民军后方的安全，并使那些叛军将要进攻的地方的人产生恐 J 嗓。这样的恐怖行动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到内战结束时，至少有 20 万名国家主义“十字军”的敌人被以这样的方式处死。

两个西班牙

当西班牙陷入全面内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时，外国的观察家们急于给两派贴上整齐的标签，藉以给纷乱的现实硬套上某种想象的秩序。按

照个人喜好和政治观点，一派是“共和派”，“忠诚者”和“红色”；另一派是“叛乱者”，“国家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简单。投身于共和国事业的有很多派别— 他们之间很难相安无事— 保守的、信奉天主教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各种类型的加泰罗尼亚分子；温和的和左倾的共和派；右翼和左翼社会主义者；信奉斯大林和反对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目标、对战争目的以及如何作战的看法，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共和派”之间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西班牙国家主义派也是由各种力量联合组成的：军事叛乱分子，长枪党分子，卡洛斯派，阿方索保皇派，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支持者，和各种独立保守派，天主教派和机会主义者。意识到这一事实，以及想要迎合温和的共和派的意见，致使早期的叛乱声明仅限于模糊地号召防止左翼革命，维护民族团结和恢复权力；除此之外，人们仍然不清楚，在叛乱成功后是建立一个保守的、更加专制的共和国，还是恢复君主制，或实行军事独裁，甚至建立一个彻底的法西斯主义国家。

在内战的第一年，团结和权威的问题在两个地区都大致解决了。对共和国而言，其经历是痛苦的，而且如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是弄巧成拙的；而国民党则通过对权威的一致顺从而联合起来，所以进展比较顺利— 这决定了西班牙在未来四十年中的命运。

共和国西班牙的革命和权力

在 7 月叛乱之后，共和国不仅面临被军事推翻的威胁，而且还面临自己的分裂。在西班牙共和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经常受到怀疑的地方议会和警察被武装的村民和工联主义者放到一边，所以确立的权威垮掉了。现在基层的权力转到“反法西斯”委员会手中，委员会的构成则视地方上忠于左派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在地区的层面上，也出现了新的权力中心：在沿海的巴斯克省，由于与西班牙共和国相隔绝，出现了巴斯克独立分子的巴斯克共和国；在加泰罗尼亚，孔帕尼斯与全国劳工联盟达成了妥协，一个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独立于马德里控制着局面；同时在 10 月份，阿拉贡成为全国劳工联盟自治的地｛域，由它自己的地区“委员会”进行管理。第二年，共和国不得不做出努力以收回自己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新的权力机关只是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的即时反应。在其他地方，他们与自发｝的和深远的社会革命相关，其中起推动作用的是全国劳工联盟，劳工总会的左翼和加泰罗尼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 ） — 人数少但很活跃__的反斯大林的共产党。在很广泛的地区里，土地、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都经历了集体化。这一过程并不；是很平均的。马德里和巴伦西亚仍然是因循守旧的，同时巴斯克民族主义党统治的巴斯克也没有发生任何集体化。然而，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共和国控制的安达卢西亚，在创建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革

命秩序，即使它没有得到中下阶层和有地农民的一贯支持，也还是得到城市和乡村工人阶级的热情支持。革命的军事力量是工人组成的民兵，他们的提倡者相信，他们的成员献身于新社会，既是保卫革命的需要，也能够击败法西斯主义。

在许多地区，伴随着革命的是立刻处死当地的统治阶层— 地主，有钱有势者，警察和教士。数字相当巨大— 例如，在西班牙共和国内大约有 6000 多教士死亡— 这也是对共和国名声的站污。然而，也必须承认，在共和国的地域内大多数杀害右翼分子的行为都是自发的，而政府则致力于结束这种杀戮，从长远来看这种努力获得了成功。在国民党占领的地区则对左派进行了蓄意的和持续的追捕，其间的反差一目了然。

权力的分散和革命力量分裂的潜在可能性，给遭受国民党进攻马德里威胁的共和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希拉尔政府同过去一样都是由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它越来越与新的形势不合拍。1936 年 9 月 4 日，它因此而被拉尔戈• 卡瓦列罗领导的、包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真正的“人民阵线”所取代。尽管有着许多缺点，拉尔戈• 卡瓦列罗仍是左派中有着足够名望的、有可能引导革命走上成功的唯一的政治人物；在 1934 一 1936 年期间他提倡“工人联盟”，帮助消除了一些相互的敌意— 这些敌意曾使得他与全国劳工联盟的关系恶化，同时 1936

年他作为“西班牙的列宁”的角色使他有可能与西班牙共产党形成紧密的联系。这样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全国劳工联盟有数量上的优势和革命的作用，同时一旦前苏联的援助在 10 月份到达，共产党人就拥有了优势。12 月 4 日，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以 20 世纪在意识形态上做出最大自我牺牲的姿态，压制住他们对执政者的仇视，加入了共和国政府。两天后，由于国民军已经到达了马德里西郊，政府离开了被围攻的、而且人们一致相信注定要遭厄运的西班牙首都，前往更加安全的巴伦西亚的避难所。

共产党人和共和国

拉尔戈• 卡瓦列罗政府的广泛性，并不能说明它的成员在看待战争的性质和责任方面是一致的。1936 年夏天出现了两种观点。对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少数社会主义左派而言，在共和国控制的区域内的社会革命已经成为与法西斯作战的主要原因，而且也确实是指望工人和穷困的农民与之作战的唯一基础。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像拉尔戈• 卡瓦列罗内阁的海军和空军部长普列托，以及财政部长胡安• 内格林那样的右翼社会党人，都认为集体化会引起经济崩溃，而且会使中下阶层和境况较好的农民疏远共和国。至于民兵，虽然他们狂热而英勇，但他们不可能战胜国民党的军队。政府的权威必须恢复，经济和战争努

力必须得到有效的管理，必须用纪律严明的常规部队取代混乱的民兵组织。

这些反革命的观点与西班牙共产党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忠实地遵循斯大林的“人民阵线”的路线，即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保持团结。共产党人坚持认为，在西班牙，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取得胜利，要发展出合适的“客观环境”。由于苏联的帮助，共产主义者赞助的志愿者和第三国际的代表在 1936 一 1937 年冬天进入了西班牙，共产主义的影响无论在政府内还是政府外都扩大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增加了，它的社会保守主义立场和对纪律的强调，吸引了许多专业人士、军官以及城市和乡村中下阶层的成员。

到 1937 年春天，拉尔戈• 卡瓦列罗政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住社会革命的进程，并且把民兵吸收进以共产党人自己的第五军团为中心而建立的正规部队中。然而，社会革命并没有彻底逆转，拉尔戈• 卡瓦列罗并不愿意向共产党人、共和派、温和的社会主义同盟所希望的那样，迅速地转向反革命的方向。而且，他对共产党人在所涉足的领域里一例如在军队和行政部门一 明显地试图扩大影响并发号施令越来越感到生气。而这些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前苏联和第三国际的主子，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于总理的不合作和对战争的领导不力。随着在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对手之间产生对抗，西班牙

共和国的政治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37 年 5 月初，危机在巴塞罗那爆发，危机爆发的形式被乔治•奥威尔形象地描绘为“内战中的内战”。一面是全国劳工联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面是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PSUC ）里的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双方进行了 4 天的街战，结果是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巴伦西亚政府的军队占领了巴塞罗那。当拉尔戈• 卡瓦列罗顶住共产党要求解散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并逮捕其领导人的压力后，共产党人判定，抛弃他的时候到了。1937 年 5 月 16 日，他们策划了一次内阁危机；拉尔戈• 卡瓦列罗辞去总理职位，由内格林所取代，后者领导着一个没有左翼社会主义者而且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愿参加的内阁。内格林政府的政策很清楚，就是很务实地追求胜利，包括使革命发生逆转，维护政府的权力和对共和国民主的信心，维持与苏联的良好关系。在 1937 年的春末和夏季，革命在它以前的两个据点被迫退却了：加泰罗尼亚放弃了自治而加入西班牙共和国，而在阿拉贡，由全国劳工联盟所领导的阿拉贡委员会实际上已经被共产党的力量所破坏。西班牙独立右翼各党联盟成为血腥清洗的目标，它的领导人安德鲁• 尼恩被抓获，受尽折磨后被苏联秘密警察杀害。虽然颇有主见的内格林决非如许多批评者所谴责的那样是受共产党利用的人，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无法阻止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共和国内部起越来越独立的、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

国家主义的西班牙：佛朗哥的出现和兴起

在 1936 年叛乱之初，弗朗西斯科• 佛朗哥当然并非最后注定要成为最高统帅，更不用说成为西班牙未来的领导人了。20 世纪 20 年代他在摩洛哥所表现出来的军事能力为大家所公认和敬重，作为被指定的非洲军团的指挥官，他对那场密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其他将军一 叛乱名义上的领导人圣胡尔霍；叛乱的“指导者”莫拉；或叛乱的主要策划者戈代德（他被任命领导加泰罗尼亚的叛乱）一 似乎更像是统领全局的人物。撇开他的年轻不谈一 他在 1936 年只有 44 岁一他对卷入阴谋活动的谨小慎微，招致其他军官的许多批评，一些人轻蔑地给他起了个绰号“1936 年加那利群岛的女士”。在叛乱开始一周后，叛乱者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国防委员会”，当时，佛朗哥并不是其中的成员，几周之后他才被吸收为成员。

然而，佛朗哥在西班牙国民军中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是相当迅速的。同情者在其中看到了上帝的眷顾，而敌人则怀疑其中有“阴谋诡计”。当然运气和有利的形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圣胡尔霍在叛乱刚开始就死掉了，当时一架飞机要把他从流放地葡萄牙接回西班牙，但刚起飞就坠毁了。戈代德则在巴塞罗那叛乱失败后遭到囚禁，后来被处决了。莫拉在西班牙北部指挥着非常艰苦的战役，而且卡洛斯派的破坏活动搅得他心神不宁。至于作为文官有可能成为政治领导人的卡尔沃• 索特洛

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死掉了，希尔• 罗夫莱斯仍然因为政治上的失败而名誉扫地，而何塞• 安东尼奥则在共和国的监狱中倍受折磨。

个人竞争对手的清除毫无疑间为佛朗哥获取权力铺平了道路，真正使他开始这一进程的，是他在叛乱中被分配的角色以及他履行这一角色的方式。一旦在西班牙半岛的叛乱失去其最初的推动力量，作为非洲军队指挥官的他就将处于决定性的位置。为了使他的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达西班牙，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交易是必要的，这种交易的成功确立了他与国家主义派强有力的联盟，这种关系是其他的叛乱领导人所不具备的。1936 年夏末，在他的指挥下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战役，这使他作为国民党的西班牙最成功的将军而倍受瞩目。1936 年 9 月底，在一致公认需要一位军事总指挥官的情况下，国防政务会在萨拉曼卡召开会议进行选举，当时只有一位经过慎重思考的候选人了。9 月 28 日，佛朗哥接受了军队最高统帅的职位，而且成为“拥有新国家所有权力”的“西班牙国家政府元首”。如果没有佛朗哥和一帮武官和文官支持者（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的政变，这种对政治权利和军事指挥的掌握并不代表什么；几天后，佛朗哥悄悄地把自己提升为“国家元首”，这一称号一直保留到 39 年后他死去为止。

佛朗哥独裁的推进

国家主义西班牙最高领导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新出现的国家的明确的形式还没有确定。在佛朗哥看来，国民军控制地区内部最大的问题是仍然存在着独立和争权夺利的政治运动。就数量而言，到目前为止，最成问题的是卡洛斯派和长枪党，自内战以来，两个团体都获得了大规模发展一 在长枪党方面则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卡洛斯派主要招收怀疑长枪党法西斯主义的保守的天主教徒；长枪党在其迅猛发展时期同欧洲其他法西斯运动一样，从各种政治派别吸收了成千上万的成员，包括前投降派分子和共和派分子，甚至包括渴望把自我保护和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结合起来的左派分子。

在佛朗哥上台后的几个月里，有三种考虑促使他着手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当然，首要的原因是自治的和有独立意识的政治运动威胁他的个人权威，而且从长远来看会削弱他作为国家首脑的地位。卡洛斯派除了惹点麻烦外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是拥有广泛号召力和发展迅速的长枪党就不同了。第二个原因并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不愿在战争期间容忍政治分裂。这种分裂—如同在共和国的控制区里发生的那样—会削弱军事效率。第三，佛朗哥和他的内弟拉蒙·塞拉诺·苏涅尔之类的顾问们，在展望战后的西班牙时，深受意大利和德国先例的影响，越来越为一党制甚或集权国家的观念所吸引。

在 1936-1937 年冬天，佛朗哥因此把右翼的民兵置于军队的严密控制之下，并开始确立自己凌驾于所有党派之上的权威。两大党派的内部问题毫无疑问有助于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就长枪党来说，最主要的问题是领导权问题;何塞·安东尼·普里莫·德里维拉在战争爆发之前被囚禁在阿利坎特， 1936 年 11 月被处决，他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充满党派之争的团体，并深受第二代可能的继任者们争权夺利之苦。卡洛斯派同样受内部纷争之苦，当 1936 年 12 月它的政治领导人法尔• 孔德因极力主张其团体的独立而被佛朗哥放逐时，他们根本无法做出抵抗。1937 年 4 月 19 日，清算的日子到来了，该日，佛朗哥颁布了一个统一法令，创建了国家主义西班牙唯一的政党。该党被奇怪地称作西班牙传统主义长枪党与工团主义民族奋进会，人们方便地把它称作 FET 或国家主义运动，在佛朗哥的领导下，合并了长枪党、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国民党的其他的小派别。结果，这种野心勃勃的而且看起来带有挑衅性的行动很容易就实现了。虽然许多卡洛斯派和长枪党成员本来不喜欢这种统一，但是由于他们的战斗人员均身在前线，因而没有人能够进行抵抗，而且他们同一般的国家主义者一样，都尊重“权威”。无论如何，两个党派内的其他大多数人都服从这一新的秩序，并急急忙忙地要在 FET 机构里争取一官半职。

1937 年 4 月的“统一”，以及 1938 年第一届国民党内阁的任命，

都是建立独裁政体的最初的步骤，随着 1939 年国民党的胜利，这一政体后来统治西班牙达 36 年。这一政体在内战结束时就已经存在，在该政体内部，最明显的特征是，FET 是主要的角色，但并不进行统治；恢复了天主教会在教育和重要文化影响方面的垄断地位；对所有形式的反抗进行残酷镇压；最重要的是，佛朗哥本人进行全面控制，其地位不容置疑。

军事斗争

退却中的共和国：1936 年 11 月-1938 年 1 月

出乎人们普遍的预料，马德里在 1936 年 11 月尚没有陷落。如果佛朗哥不是为了前往托莱多而向东绕路而行，耽误了进攻，也许马德里已经陷落。在托莱多的国家主义者卫戍部队的军营－ 阿尔卡萨尔受到左派民兵的围攻，为该军营解围，尽管使佛朗哥在全世界大出风头，并帮助他爬升到军事和政治总指挥的位置，却也给共和国提供了组织首都防卫的宝贵时间。当最后开始进攻时，马德里顶住了进攻，这部分是由于左翼民兵和城中民众的勇敢，部分也是由于第一国际纵队－ 由第三国际组织的外国志愿者，他们在关键的时刻来到马德里－ 顽强斗争的结果。一连几个月，马德里一直处于激战之中，下半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普列托和共产党人所希望的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形成了，在这一过程

中发现了有能力的指挥官：例如，自 1936 年 n 月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比森特• 罗霍；“马德里的救星”米亚哈；共产党人莫德斯托、利斯特和“农民派”巴伦廷• 冈萨雷斯；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西普里亚诺• 梅拉。然而，由于共和派在战略、战术和供应问题上一直有着派别之争，因而它已经不能收复失地。共和派在马德里西部的布鲁内特（1937 年 7 月），阿拉贡的贝尔奇特（1937 年 8 一 9 月）以及阿拉贡更南部的特鲁埃尔（ 1937 年 12 月一 1938 年 2 月）的进攻，都陷入了同样的局面，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获取的小块地盘，很快就被反攻的国民军收回，而在此过程中共和派还要蒙受更大的损失。国家主义派同时屯兵马德里周围并集中对其他地方发动进攻。他们拥有了佛朗哥这样一个领导人，尽管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满意他的缺乏活力和广阔的视野，但他是一流的战地指挥家，他致力于对西班牙的上地及人民进行渐进的、强有力的征服。

在 1937 年的战争进程中，外国卷入— 和不卷入— 战争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和更复杂。因此，下面我们更细致地考察西班牙内战的这一方面。

外国的干涉和不干涉

英法采取和坚持不干涉政策，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对西班牙争端保持最严格的中立，深深地影响了西班牙内战的进程。倒不是西方民

主国家直接卷入战争会有什么问题；受到威胁的是共和国合法选举出来的政府从他的民主同道那里购买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的权利。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不愿承认这项权利。在法国，严重的政治分裂，害怕外国军事卷入和听从英国，迫使布鲁姆和人民阵线政府改变了最初帮助共和国的政策而主张不干涉，希望促使其他列强也不干涉西班牙。1936 年和 1939 年法国内阁总体的右倾趋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姿态，只是在 1938 年早期布鲁姆短命的第二政府期间这一政策暂时被打断，资助暂时得到恢复。

在英国，保守派支配的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对法西斯国家实行绥靖政策，他们渴望阻止西班牙战争的蔓延，为此他们甚至对意大利、德国和前苏联的卷入熟视无睹。而且，在保守党内部，虽然一些持不同意见者— 如丘吉尔，尽管为时已晚— 认识到，打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更有利于欧洲和平，但是对西班牙“红色力量”的仇视和对佛朗哥的同情还是占主导地位：商人团体也是如此，他们的许多成员在战争期间继续同国民党西班牙进行贸易。工党和自由党尽管全力地和热情地支持共和国的事业，但是并不能改变英国的政策。在美国，对欧洲混乱的恐惧和许多美国天主教士的亲国家主义的狂热，实际上抵消了民主团体对共和国的同情。

不干涉在机构上表现为不干涉委员会，它于 1936 年 9 月成立于伦

敦，用来监督这一原则的实施。民主国家和一些欧洲小国遵守这一原则，但欧洲三个最强大的专制政府却对它表示了公开的蔑视。前苏联、意大利和德国，自然会通过援引另一方的行为，证明他们破坏自己所承认的不干涉政策是合法的。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宣布，不干涉“是一道漏水的堤坝，但总比没有堤坝好”，它可以防止战争的全面爆发。没有人能够肯定他是否正确；唯一能够肯定的是，由于意大利和德国几乎从一开始就帮助国家主义派，不干涉政策把西班牙共和国送进了愿意帮助她的唯一的大国苏联手中。

1936 年 10 月之后的两年里，苏联的援助帮助了共和国继续战斗。援助本身有各种形式：武器和弹药，包括大约 1000 架飞机和 700 辆坦克；苏联和第三国际的军事－ 和政治－ 顾问；国际纵队：大约由来自世界各地的 60000 名外国志愿者组成，他们大都是受法西斯政权迫害的流亡者或者反法西斯斗争的老兵，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招募和训练的。因这种帮助共和国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为了应付财政支出，政府除了让人量的金银储备运往苏联外别无选择。然而对战争本身影响更大的是政治代价，体现为西班牙共和国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对内阁构成和战略规划的干涉；社会革命的逆转；对政敌的迫害；以及群众士气的连续受挫。无论如何，在西班牙的战争成为全球冲突的一部分，而英国和法国与苏联一起同欧洲法西斯作战以前，前苏

联的援助从没有打算武装共和国夺取胜利，甚至于没有打算让它有能力进行抵抗。一旦在 1938 年 10 月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苏联的期望落空后，斯大林就失去了对西班牙的兴趣，终止了对当时处境危急的共和国的援助。事实证明苏联是一个不可靠的朋友。

国家主义派在同外国的交易方面进展顺利。在绝对数量方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提供的人力和物力的帮助— 飞机、坦克、装甲车，小规模的武器和弹药，7 万一8 万人的意大利“志愿者”和拥有 600 架飞机和 200 辆坦克的德国秃鹰军团— 有可能超过苏联对共和国的援助。更重要的是，德国和意大利总是有求必应，尤其是在国民党受挫之后或发动大的攻势之前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它们总能如期而至；它的援助是通过作为国家主义领导人的佛朗哥，而不像前苏联援助共和国那样通过一个政治派别；而且援助只要求分期付款，而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款。虽然德国曾寻求，而且在短期内曾成功地把国家主义西班牙转变为一个经济的附属国，但是德国和意大利均没有显著地干涉国家主义西班牙的内政。

共和国的垂死挣扎：1938 年1 月-1939 年3 月

不干涉和外国援助对双方的不同影响，使得共和国几乎不可能取得胜利。特别令人注意的是，1937 年年中在失去北部后，共和国的抵抗

仍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 这归功于军事力量的组织有所改进和人们的勇敢。另一个原因是佛朗哥不同一般的谨慎，他宁可选择慢慢地推进和实实在在地占领，而不选择不必要的冒险。尽管缓慢，国家主义派对西班牙的逐步征服却在继续着。1938 年 4 月，他们东进到靠近卡斯特利翁的地中海，切断了加泰罗尼亚与共和国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联络。如果继续进攻，也许加泰罗尼亚很快就会陷落；但佛朗哥却向南转向了巴伦西亚— 可能是因为在 1938 年年中的国际形势下，佛朗哥害怕如果自己向法国边境进军，法国会进行干涉— 结果他的进攻被共和派的抵抗所遏止。7 月，共和国发动了战争中的最后一次进攻，80 00 。人渡过埃布罗河，试图把加泰罗尼亚和“中心区”重新联接起来。如果说围攻马德里是内战中的第一部主要的史诗，那么同样被歌曲、诗歌和散文所纪录的埃布罗之战，则是最后一部。战争持续了三个多月，在很大程度上重复着共和派进攻的固有模式：先是取得了突破，接着是被迫撤退而且损失惨重— 在这次战役中，共和派有 20000 人战死，55 。。。人受伤或被俘。埃布罗战役之后，已不可能指望加泰罗尼亚再维持多久，而加泰罗尼亚一旦陷落，共和国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则会相继沦陷。

胡安• 内格林时运不济，在共和国漫长的垂死挣扎过程中，他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总理。如果说拉尔戈• 卡瓦列罗的任务曾非常艰巨的话，内格林的任务则是不可能完成的。共和国继续依赖苏联，使得共产党人

一直在共和国西班牙内部产生影响，而务实的总理对此却无可奈何。共产党人和他们的第三国际援军在纯粹的军事方面（如在组织共和国国民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虽然他们并没有为共和国的胜利提供可能性，但他们却延缓了它的失败。共产党人取得的负面的成就是恶化了共和国西班牙的政治空气。他们攻击社会革命，使军队政治化，不能容忍反对派，更严重的是，他们通过 SIM （军事调查部）到处使用残酷的秘密警察，这些都使得共和国区的许多居民相信，法西斯的压迫可能并不比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更坏。

在 1938 年期间，厌战和悲观情绪开始严重影响共和国西班牙。随着共和国区域的缩小和农业收成的减少而带来的营养不良更进一步促使士气消沉。对那些靠“内格林博士的抵抗药丸”－ 小扁豆－ 生活的人来说，从国民党飞机上投下来的、告知他们在国民军占领区有大量食物的传单，是比炸弹更有效的武器。这种信息也是千真万确的：国家主义西班牙以西班牙的农业区为基地，它稳定地拓展地盘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因而它从不缺乏粮食。在共和国西班牙的领导人物当中，总统阿萨尼亚和普列托认为失败迟早是不可避免的；1938 年 4 月，在一次共产党人组织的战役之后，普列托因为他的“失败主义”而被从国防部长的位置上撵下来。面对佛朗哥要使共和国无条件投降的决心，获得妥协和平几乎毫无希望。内格林只能继续希望全面战争的爆发会使得

民主国家开始对共和国进行援助:但是在 1938 年 4 月签订了英意海军协定之后,这种希望落空了,而且在慕尼黑协定之后由于斯大林的转变,这种希望更加渺茫。1939 年 2 月底英国和法国承认佛朗哥政权，使得共和国外交地位的孤立无助更加突出。

在经历了两年半的顽强抵抗后，共和国在 1939 年的头三个月里迅速垮台了。在 1 月和 2 月初加泰罗尼亚被国民党占领；佛朗哥的军队俘虏了 20 万人，几十万平民和军人流亡者提前逃进了法国，其中就有阿萨尼亚和共和国政府的一些成员。3 月份共和国的“中心区”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在它陷落之前，发生了第二次“内战中的内战”：这是一个既悲又喜的事件，其中，在卡萨多上校领导下的希望谈判投降的“叛军”，发动了政变，结果与渴望战斗到底的共产党人发生了冲突。在马德里卡萨多取得了胜利，最后共产党人的力量被瓦解了。但是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佛朗哥仍然和过去一样不倾向于和谈。3 月 26 日国民军进入马德里，月底他们占领了共和国的其他地区，4 月 1 日佛朗哥宣布内战结束。右翼的支持者们用君主制的旗帜和法西斯的敬礼欢迎他们的解放者，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他们是第一次公开露面，与此同时，其他西班牙人面临着恐怖的未来：一些人出于恐惧选择了自杀。几十万的西班牙人和非西班牙人在 1936 一 1939 年死于西班牙的战场；可能有几万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处决或死于监狱，几万人遭受囚禁或被强

迫劳动，成百万的人因为曾为共和国作战而终生受人歧视。从纯军事的意义上来讲，西班牙内战也许是结束于 1939 年 4 月 1 日，但是对它的胜利者弗朗西斯科• 佛朗哥而言，它并没有真正结束。

第四章 解释，争论和结论

西班牙内战在当时曾激发了人们的狂热情感，它一也不可避免会引起历史学家不同的看法。在西班牙国内佛朗哥政权多年来一直只允许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亲国民党的报道出版，而把严肃的学术研究的领域让给外国人（主要是英国和美国人）。即使他们也难于或不可能接触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然而，随着西班牙新的民主的到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量原来无法接触的研究资料现在可以为历史学家所用，而且现在是西班牙人顺理成章地出现在研究、出版和挑战过去正统的最前线。所以关于西班牙内战及其起源的争论一直很活跃。下面这一部分试图简要考察几个争论最激烈的领域。

西班牙的民主为什么失败？

由于历史学家是有血有肉的人物，而且往往带有充满感情的信念和意见，同时由于西班牙内战代表着一个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情感内容的最近的历史事件，所以毫不奇怪，关于 1931 一 1936 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叙述通常缺乏学者们在更古老的事件中所能得到的客

观性。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合理地强调，试图使一个国家民主化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困难，但不可否认，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批评企图在这样一个整体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的国家进行民主化是枉然的。分歧渐渐集中到造成左派和右派的势不两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共和国的民主不能运转的责任上。各个学者把原因归罪于左派或右派，通常都取决于他的意识形态立场— 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历史观。

对那些以明显的积极的眼光来看待 1931 一 1933 年政府的改革动向的人来说，共和国的命运可以通过下列原因来解释：西班牙社会潜在的两极分化，民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保守派和特权阶层的顽固，以及右翼的主要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不愿意接受共和国和民主运转所必需的财富重新调整。人们因此认为，左翼的战斗性和社会党特别的左倾是对右翼不妥协的反应，而右翼对政治崩溃、社会冲突进一步恶化和内战负有主要责任。这一观点的批评者以不同的方式指出，社会党的“暴力”倾向先于右派；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树立了不必要的敌人，而且从总体上说，针对什么可以构成其可以接受的“共和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左派观念太狭隘；而且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作为一个潜在的基督教民主党，已经沿着真正的民主方向在演化，但实际上被左派的行为逼向右倾。

这些争论清楚地表明，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在政治和社会

方面有着许多潜在的冲突，新的民主必须面对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和欧洲在意识形态上两极分化的现实，同时还要应付复杂的政治变动和紧迫的社会问题。关于“责任”的观念难以同个人对下列问题的看法分开：改革的紧迫性，保守派的抵制合理与否以及下层的急躁。认为如果重要的人物或组织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事情的结果就会不同的看法，是无视这些人或组织进行活动的环境，他们对环境的认识以及他们的观点由以形成的传统。在谈到复杂的历史现象，例如政体的失败和崩溃时，历史学家如果不能完全不用，至少也要慎用“不可避免的”这一词汇；所以在涉及到西班牙共和国这一问题时，我们只要说它失败的可能性总是大于存活的可能性就足够了。

为什么佛朗哥赢得了内战？

当然，在没有出现内战的情况下民主也经常会失败。西班牙在 1936 年爆发内战是由于以下原因：双方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大致相等，叛乱者没有迅速取得胜利，共和国武装了工会民兵，以及更重要的是，法西斯国家国家主义派一方的支持。苏联对共和国一方的援助也使得这场战争后来持续了数年而不是数月。

许多作家都同意，一旦内战开始进行，对双方来说，其结局都取决于外国的援助和影响以及与国内政治和军事因素联系起来的方式。军事

和经济史家继续为内战双方接受援助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为此付出的经济和财政代价而争论不休。然而，这些也许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撇开数量不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对共和国的援助主要是打算延长抵抗的时间，而轴心国对佛朗哥的援助则以取得胜利为目标。加上共和国遭到原以为是自己的民主同道的国家的背叛，以及遗憾的不干涉闹剧，国家主义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一点历史学家们并没有什么争论。

在处理内部的派别方面，国家主义派更为成功，对此，学术界的意见也同样一致。然而在涉及到共和国西班牙的内政时，就有很多不同意见。最激烈的，有时甚至是刻薄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苏联对共和国的援助问题一 以及共和国因此而付出的军事和政治代价。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从 1936 年 7 月末起共和国已不可能从其他地方获得帮助。作为进行援助的要价，苏联从有利于自己的外交政策出发，要求废止革命性的变革，要求进行常规的而不是游击队的或“革命的”战争，要求恢复共和国的权威以及大幅度增强共产党的力量。尽管很少有历史学家为共产党人的过分行为进行辩护，但是也有些人指出，正是他们全力以赴地执行以他们的名义制定的战略，才使得共和国能够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但是人们从极端左派而非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最尖锐的批评一 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这些批评者认为，苏联对共和

国的胜利并不感兴趣，也不愿提供有可能使它获胜的足够的资源；更糟糕的是，它的反对革命的政策，以及共产党人通过剥夺共和国西班牙许多人为之奋斗的东西而实行的总体压制行为，造成了普遍的士气消沉，削弱而不是加强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基础。他们指出，为了打败按照传统的军事眼光来看可能比较强大的敌人，需要基于社会变革的革命战争，这既会激发共和国西班牙人民的热情，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敌占区的革命。

对共产党人的战略和行为进行的否定批评，大致上是有道理的，尽管其中隐含着的是一 或应该是一 对英法政策的更大批评，这种政策使得共和国除了从其外交姿态为英法政府所不齿的苏联得到援助外，丧失了获得其他援助的可能性。如果不依靠任何重要的外来帮助，而追求“革命的”另一条路线，看来也同样不可能取得成功。立即恢复来自共和国民主同道的支持，或苏联的帮助基础广泛的革命战争而不是宗派的传统战争，两种情况都可能会给西班牙内战带来不同的结局。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气候下，两种情况都难以出现。

佛朗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 2 。世纪 30 年代期间，“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分子”这样的词汇相当流行，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被应用到国家主义的事业和突然出

现的佛朗哥政权上。尽管这样的词汇在国家主义的宣传中起的作用很小，而且它们所包含的观念并不合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天主教派和以前的自由君主派的胃口，但长枪党的显赫地位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卷入，足以使大多数外国观察家（并不仅仅是左派的人）相信，西班牙叛乱者的确就是“法西斯分子”。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法西斯主义”已经成为严格的学术分析的对象，结果是人们做出大量的努力，试图确定这一标签对西班牙的情况是否适合。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通过以极端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和意大利模式的独特“方式”为基础而做出的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来探讨这一问题。他们得出的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长枪党和它的前身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在内战前的西班牙是唯一确切的法西斯组织；尤其是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根本不应该得到“法西斯分子”的称号；1936 年长枪党得到迅速发展，之后它被迫与卡洛斯派和天主教右翼合并，但在 1937 年它在政治上还是中立的；接下来的政权，完全由非长枪党分子佛朗哥控制，因而不是法西斯主义的一 不管它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种观点的批评者，尽管通常也承认可以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模式相比较，但他们还是把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不同特征，作为财产的军事保卫者和左派的毁灭者的角色，以及意人利法西斯政权的实质特征而不是外部特征作为他们研究的出发点。这使得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193

1 年和 1936 年间，西班牙右派作为一个整体发挥的作用类似于 10 年以前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右派内部意识形态和计划的不同，并不见得多于意大利法西斯内部的分歧，而且无论如何这对成千上万的右派斗士、支持者和选举人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都对民主和左派持有敌意，都热衷于建立某种独裁的联合国家。因而左派和共和派有理由认为，不管右派整体还是部分获得权力，都同样会让他们不高兴。如果 1936 年以前的右派因此可以被“客观地”视为法西斯分子，那么顺理成章地可以把从其演变而来的战时联盟和 1936 年 10 月后出现的佛朗哥政权看作“法西斯”。

在这两种探讨中，第一种的优点在于它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意识形态分歧对每一个右翼政党的某些成员来说毫无疑问是很重要的，而且后来会影响佛朗哥政权的内政。然而第二种确实更接近子反映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实和感情。对在内战中和后来可怕的镇压中战斗和死去的成千上万的西班牙— 以及非西班牙— 的民主人士和左派人士而言，他们与之搏斗的力量本质上与新近给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带来独裁和压迫的力量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指称他们的敌人的合适的名字，那么一个半世纪以后，生活优裕的历史学家们在宣布这些人错了之前需要斟酌再三。